

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
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1956-1980）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A Study o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1956-1980)**

孙小惠

SOON CHEN HUI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5**

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
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1956-1980）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A Study o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1956-1980)**

By

孙小惠

SOON CHEN HUI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APRIL 2015**

摘要

南洋大学于1956年开课，中文系也于同年开课。至1980年南大被并入新加坡大学为止，前后共有21届毕业生。南大学生毕业后纷纷投入社会工作，中文系毕业生也分别涉足政、经、文、教各领域。本论文将以华文高等教育及中华文化承传之关系的视角切入研究南洋大学中文系。本论文旨在透过对中文系沿革的描述，探析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如何以本身涉足的领域作出贡献，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并融合本土多元文化，让现今新马华社有所参照和借鉴。

关键字：华文高等教育、中华文化承传、南洋大学、中文系、文化人才

Abstract

Nanyang University developed in year 1956,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lso started at the same time. Nanyang University has cultivated 21 badges of graduates before it combined in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graduates work in different field such as politic, econom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main issue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focused o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cademic staff and curriculum.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s of graduate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ll be proven that they are needed by Chinese community in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Keyword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Nany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ltural talent

谢词

历经数年硕士论文终得以完成，过程中要感恩的人很多。首先很感谢这期间得恩师黄文斌老师的教导与鼓励及师母的支持。笔者也感谢林纬毅老师抽空进行访谈及指点研究方向。还有曾给予笔者论文建议及指导的古鸿廷师、曹淑瑶师、梁秉赋师、林开忠师、严智宏师、龚宜君师、陈佩修师、廖建裕师。笔者也要感谢在收集资料期间，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孙敏炎先生、李建昌先生提供协助。

曾经共同奋斗的好朋友们，露仪学姐、慧娴、凌香、慧倩、雍信学长、燕文、丽珠姐、秋霞学姐、汉伦学长、晶木、静怡、佳佳、修纯等人在不同阶段给予笔者帮助，给笔者论文各种意见和用心评论，感谢这期间在我身边出现过的所有人、事、物。

最后要感谢父母及家人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给予宽大的包容与耐心，让我不必为家里操心，能专心完成论文。谢谢你们！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
(1956-1980)为孙小惠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
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黄文斌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5.04.2015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孙小惠（学号：**09 ULM 09081**）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黄文斌副教授兼副院长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1956-1980）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孙小惠）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孙小惠

日期：25.04.2015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ii
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
论文提交书	vi
论文声明	v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5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9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5
一、文献研究法	16
二、口述历史法	17
第五节 章节简介	17
第二章 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成立与草创期（1956-1965年）	21
第一节 成立背景	21
一、中国、台湾中文系渊源	22
二、新马华文教育背景	24
三、华社建校需求	28
（一）完整的教育体系	29
（二）培养师资	30
（三）承传中华文化	31
第二节 初创期	33
一、师资来源	33
二、课程设制	35
（一）第一次课程修订（1958年）	38
（二）第二次课程修订（1960年）	39
（三）第三次课程修订（1965年）	42
三、学会与出版的发轫	46

第三章 南洋大学中文系发展与演变（1966-1980年）	51
第一节 南洋大学与南大中文系发展概述	51
第二节 课程转型与本土化	54
第三节 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境	67
第四章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承传中华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75
第一节 教育与学术	75
一、 高等教育	75
（一）任职人数	76
（二）教学与行政职位	78
二、培养中学师资	81
三、学术研究	84
第二节 传媒与文化	87
一、新闻报道与编辑	93
二、中英翻译提升华文水平	94
第三节 文学与创作	97
一、文学创作	98
二、报人与副刊创作	100
第四节 历史与政治	102
一、历史记载	102
二、政治、社团领导	103
第五章 结语	105
征引书目	111
附录	12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主要以马来亚或后来独立的新加坡之南洋大学中文系为个案研究。论文的主题是“华文高等教育”及“中华文化承传”。这两个主题对马来亚或新加坡来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新马中华文化之发展与华文教育之兴衰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华文高等教育。

华文教育的发展被认为是延续华人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教育与文化，彼此互相影响，在文化不断地变动中，教育扮演着接前推后的角色（林水椽主编，1985：10）。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具，文学、宗教及哲学思想等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存在，文学及宗教等就存在；相反的，语言文字灭亡，文学等也就跟着灭亡。教育及其单位是语言文字的传习所，所以教育及其单位是文化的核心传播站；通过传习所以对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导，人类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基地，保存及传播自己的文化，世代罔替（郑良树，2008a：147）。华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般上当谈及“华文高等教育”及“中华文化承传”，前人的角度和对象多是只谈中、小学华文教育，忽略了华文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是以笔者选择南洋大学中文系作为个案研究。选择南大中文系的另一原因乃因南大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高等教育

代表，它有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开山鼻祖的时代意义。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不再仅止于学生毕业后找工作的技能，它的功能已到了学术思想研究的阶段。高等教育这一阶段的功能有助于解决中华民族深层文化的问题，以维护中华文化之承传。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由三大民族即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早在 16 世纪，这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目前在马六甲三宝山上发现到最早的坟墓即明朝的坟墓，可见明朝开始便已有华人移居此地（黄文斌，2013：44-47）。一直到 20 世纪仍有许多华人不断移居来此，但他们仍然认同中国为祖籍地，绝大部分移民仍想回到中国。然而，在马来亚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前，侨社已开始转型，而且在独立后成功改变为华社，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转型后，通过法律的程序及意愿的宣誓，华社放弃第一特征（效忠中国），转而效忠马来亚。然而，华社不愿意放弃第二特征——认同中华文化。一方面基于教育原理的需要，一方面基于民族的尊严，华社将政治效忠和文化认同分开，坚持华文教育，并且要以自己的文化教育后代（郑良树，2008b：137）。华社通过自己的文化教育后代是一种延续自身文化的方式。

马来西亚华社每一年都盛大举办国际舞狮比赛、全国华人文化节，临近华人农历新年期间，全国各地都举办大大小小的挥春比赛，廿四节令鼓的表演也常列为表演节目。从社会表象来看，中华文化令人感到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从“深层文化”来考察，中华文化之核心却有偏枯倾斜的危险（郑良树，2008b：140）。黄文斌（2005：65）曾归纳钱穆与郑良树的言论，他们分别用“高水准之华文教育”、“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史等学科”、“中华文化粗俗、古旧的一面”、“文化深层”、

“高深的学术领域”等字眼评论马华文化的问题，他们共同忧虑本地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精致”部分继承与认识较不足。所谓“精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中属于思想、历史、文学等范畴的文化。表演文化无可否认有其存在之必要。然而，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核心常被忽略，而表演文化却非常兴盛。深层的中华文化也包括学术思想文化，其发展缓慢乃因早期移民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或者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虽然他们的生活及价值观尚保留了日用而不知的儒、释、道思想，沿用在平日的待人处事上，但这还不属于学术思想这一层面。若要提升文化发展，则先要提升深层文化再回归落实到生活层面，才能达到文化被深化巩固，不至于摇摇欲坠，进而达到文化之延续。

前文已提及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并非流行文化，它不是每个人都会接触的内容。但文化的核心对一个民族而言却又极其重要，失去核心价值，民族的文化便岌岌可危。因为生活层面的文化或文化之创造往往受核心文化及价值观所引导。因此这里的华人不但只是把“先头部队”发扬光大，还要把中华文化精致的核心文化“转运”过来，加以把握并研究它，以便使它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这样的工作必须由“对中华文化核心有深刻了解的人才”来进行。有学者称这一群人为“文化人才”（黄文斌，2005：71）。从中国历史考察，传统社会的“士”阶层，除了与政治关系密切外，其主要使命就是肩负承传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一阶层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延传数千年的核心动力（黄文斌，2005：77）。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是一个工商组成的阶层，并没有明显的“士”阶层。新马华人可参照祖先承传民族文化的历史，在本地培养“士”阶层以延续民族文化。

1920 年代以后新式华小林立，但课文浅白，内容简单，除了教导儿童识字以及一些普通常识之外，也谈不上传播什么高深的中华文化（郑良树，2008a: 150）。可见华文小学教育的课程仅提供了承传中华文化的文字基础，尚无法真正培养一个能够研究与创造学术的“士”阶层。林连玉（1901-1985 年）和陈济谋亦曾于 1959 年发表书面联合谈话，其中提及：

文字为表情达意之工具，其被采用，应依两项价值而评定，此两项价值，一为实际生活上被应用之价值，又一为学术积累背景之价值。基于前者，本邦总人口中约占半数之华人，日常生活中均以华语华文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以华文供应之国民读物，乃占本邦之第一位；基于后者，华人文化有数千年之悠久历史，其学术累积之丰富，可与英文互相颉颃，由斯可知华文确为本邦极需要的文字（钟伟前主编，2004: 825）。

文中所谓“实际生活上被应用之价值”、“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小学阶段的华文教育已经让学生有使用华文于实际生活和表情达意的能力。但就“学术积累背景之价值”而言，这并非中小学华文教育能轻易办到的，这一层价值，需具有一定水准的中文程度和文化理想才能发光发热。既然中、小学教育仅能提供文化人才的基础，不足以培养能够研究并把握中华文化核心的文化人才，那么华社则须依靠大学来培养。是故，“学术积累”的职责，自然就落到了高等学府的身上。

从马华社会目前的情况而言，民间社会的培养比较困难，因为民间社会缺乏能孕育与造就人才的条件，故培养人才必须仰赖正规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大专院校教育（黄文斌，2005: 65）。而大专院校教育又需以华文教育为基础，并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层认识与文化热诚。文化人才的培养是人文而非技术的培养，要进行的是思想研究，没有其他的科系可以在大学阶段提供这类型课程来培养这些人才。纵观马来

西亚大学里的科系，只有文学院里面的中文系最直接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有关系。民族文化认识与深化的工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学习与训练，通过研读中华文化的典籍，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往前创造与发展。由于中文系的课程包含中华文化的思想、历史与文学等范畴，若学生培训得好，基本上他们将具备承传文化的条件（黄文斌，2005：75）。因此，文化人才培养的重任就得落在中文系的身上了。

综上所述，基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这一环尚须耕耘，加之个人对于中文系之情感与新马中华文化承传之兴趣，本论文所欲探讨的是高等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之关系，并以南洋大学中文系为个案研究。本论文将对南洋大学中文系从创立（1956年）至关闭（1980年）这25年来的发展进程进行论述，并着重于其课程与师资的发展与兴革，从中探讨中文系的课程与师资所栽培出来的毕业生，即前文所提之“文化人才”，如何在文教界或媒体等领域扮演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从而达到深化中华文化的目的。

第二节 研究范围

马来（西）亚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名称和范畴界定都很模糊。社会上一般都把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研究学系、汉学系等，一律统称为“中文系”。加之马来西亚境内还有师训系统与非师训系统的中文课程，其教学内容又与中文系课程相近，其范畴确实庞大。

“中文系”、“汉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差别为何？郑良树认为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所设课程除中国文学及语言之外，还包括经学、子学、典籍学及历代学术的课程（郑良树，2008d：268）。英国的大学没有中文系，有的是汉学系，而汉学系与其他的语文系，例如英文系、德文系等有天渊之别。汉学系的领域包括几乎一切有关中国的学问，例如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等（何丙郁，2006：14）。与中国庞杂无边的“汉学”相比，西方大学一般开授中国课程的学系都以语言和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为主（劳悦强，2006：171）。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学府一贯统称它为“中文系”。

表一：各大专学府“中文系”中英文名称览表

学府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南洋大学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国语言文学系
马来亚大学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系
南方学院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系
新纪元学院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国语言文学系
韩江学院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系
拉曼大学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系

南洋大学中文系的英文名称为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华文名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一般皆以“中文系”统称英文名称的“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及“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为使行文论述流畅及统一，本论文将统称“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目前与南洋大学一样的中文系名称，只有新纪元学院一所学府。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全名乃是“中国语言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其余的马来亚大学、南方学

院、韩江学院和拉曼大学，其中文系都被称为“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其中韩江学院的英文名称是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较其他学府为特别。

虽然中文系名称各不相同，课程设制各有侧重，但笔者认为中文系实际上有“无所不包”的涵容性。中国学术分野向不甚严，所谓“国学”不惟包括群经诸子重要史籍及重要专集，即道藏佛典亦在必涉猎之列。范围如此其广，学者即稍求奠定此学科的知识基础，已非十年以上不为功。近来学重分科，国学中之属于思想者入哲学系，属于史者入史学系，而文学系本身又分文学与语言两组，范围似渐缩小。但实际上分科用意只能在侧重，而求豁然贯通，学者仍需尽窥从前“国学”所包含之广大疆域（朱光潜，2001：83）。故无论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汉学系，文、史、哲不分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秉持这一点原则，系所名称事实上并不足以顾虑。

马来（西）亚境内从独立至今曾共有 6 所颁发学位的中文系，1980 年南大与新大合并后，便仅剩 5 所。笔者选择南洋大学中文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乃南大中文系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所中文系，它的创立极重要且具有时代意义。它创立于 1956 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传播站，当时马来亚人们对它寄予厚望。据笔者从访谈中了解，那个年代成绩好的学生都会选择进文学院，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选择念中文系。换言之，中文系是文学院的中流砥柱，首要设立的科系。1955 年 12 月 30 日发表第一批聘定之院长与教授名单 19 人，中文系教授在其中占了 4 人，分别是余雪曼（1908-1993 年）、潘重规（1907-2003 年）、苏雪林（1897-1999 年）（虽然《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里提到苏雪林是第一批聘定的教员，但从历年教师名录要至 1965 年度才见苏

雪林的名字列在中文系教师名录内）、王永祥（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南大开课前，最先到任的十多位教授里，中文系便占了五分之一，余雪曼和潘重规的名字更在名单的首二位，可见中文系在那个年代是极受重视和必要的科系。

南大的毕业生对新马两国的各个领域发展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李元瑾曾在《南大学人》的导论里提及：“谁也不能否认南大在艰苦环境里已为新加坡和邻近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在独立建国年代，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从1959年到1980年，南大总共栽培了一万两千五百名毕业生。对新加坡而言，四十多年来，南大生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教育各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些南大生的成就，例如学术和艺术方面的表现，更是跨越本区域的。”（李元瑾，2001：1）南大中文系在1956至1980年这过去的25年里，培养了约一千名中文系毕业生。（南洋大学第廿一届毕业生年刊执行编委会，1980）

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后大多进入了教育、传媒、文化、文学领域。他们如何能在这些领域里立足并在日后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付出力量，实与求学时期所受的课程滋养与教师影响息息相关。1974年硕士毕业生林纬毅曾说：

年轻的我，学习的兴趣和重心，是在义理这一方面。因此，特别喜欢师承新儒家大师牟宗三的苏师新鍈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庄子、魏晋玄学等课程……在正值南大盛世的纯朴校园，我有幸遇到许多大师。李师孝定是我大二中国文字学和荣誉班古文字学老师，我的小学基础，就是那时定下的。荣誉班时屈师万里来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目录学；屈老师所讲的目录学……是做学问由入门到研究的目录学。研究所二年时，高师明也来任客座教授，为我讲授儒家哲学专题……王师叔岷是校雠学专家，我更喜欢听他讲庄子、讲法家……那是确实确实从根基上阐发哲学思想的一课；不但对思理的疏通上大有帮助，更使我在治学方法和程序上得益匪浅……沐浴在纯良的学风里，我奠定了基本的治学基础。（林纬毅，2010：iii）

笔者深刻感受到他在求学时代由于老师的教学与栽培而吸收的养分，奠定了他将来的学术之路。可见，中文系的师资和课程对于栽培出来的毕业生，有着潜在的影响。

本论文的研究年限将定在 1956 年至 1980 年间，即南洋大学开课到关闭的这 25 年。论文的研究范围将锁定在南洋大学中文系这一科系，并着重讨论师资、课程发展沿革，从而探讨中文系培养了什么样的文化人才，这些毕业生又在新马中华文化的承传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哪些贡献，以论证南大中文系如何以华文高等教育承传新马华人的文化。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观察，有关南洋大学的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论文非常丰富，惟独以南洋大学中文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前人研究成果却依然是一块贫瘠的田地。虽然，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并不够完整，但希望以收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并尽可能详细地阐述南大中文系在承传中华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以南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最丰富并有系统的出版者，要数《南大学术论丛》系列，至 2012 年为止共出版了 6 本丛书。李元瑾曾于 2001 年出版《南大学人》，而后带领学者研究南大历史，成果出版成《南大学术论丛》，分别是丘淑玲的《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2006）、李元瑾《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2007）、郑奋兴的《郑奋兴讲南大故事》（2011）、丘淑玲的

《炽热年代、铿锵声音：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1956-1964）》（2012）、利亮时的《陈六使与南洋大学》（2012）和周兆呈的《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2012）。尽管研究成果丰富，但其中的研究依然着重在南大历史或学运或政治的方面，并未特别针对南洋大学中文系作出研究。

其他与南大相关的著作有陈嘉庚国际学术小组编的《南大精神》（2003）、傅孙中《南大问题评论集》（1978）、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2006）、王如明主编《陈六使——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1997）、岳衡编《南大历史只有一部》（2005）等等。尽管对南洋大学的学术研究与论述相当丰富，但大部分的学者都只注重在讨论南洋大学历史沿革、学运、林语堂事件等课题。

目前所见与本论文所欲探讨的方向有最直接联系的论文乃是古鸿廷的〈星马华人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困境：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与关闭〉（1994）。此论文讨论了南洋大学存在期间的几次重大改革，并集中探讨其改革的意义、影响及其结果。其改革范围涉及甚广，包括行政政策、课程的内容与安排，学制的变更与制定，教职员及行政主管之任免，入学标准的规定，乃至教学媒介的改变。这一些改革都在在地影响着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虽然此论文并未就南洋大学中文系作出针对性的讨论，但却让笔者从南大的六次重大改革中，看到了南大中文系发展的端倪。

与南洋大学相关的论著非常丰富，另还有不少有关南大史料收集的成果集结出版。若以丰富度与完整性为标杆，首推李业霖先生编著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2002）和《南洋大学史论集》（2004）。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把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收录这期间的各种重要文献，其中包括报告书、演讲、社论、信件等重要历史材料。《南洋大学史论集》则与前一部书有所不同，此书是以收录论述、研究南大的论文为主。此外，另有《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66）、《纪念南洋大学创校 25 周年纪念特刊》（1982）皆是重要的历史材料。由于是历史叙述，因此这三部特刊是以南洋大学整体的情况进行记载，并没有以研究者的角度书写，更不是以中文系为主体。鉴于此，南洋大学中文系是一块尚等待开发的领域。

目前所见以南大特定科系或学会为研究主体的著作或论文，较具代表性的就是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 1956-1964》（2006）。此书是作者的硕士论文，她对南洋大学学生会的进行专门论述。此外，廖文辉也著有〈南大历史系师生对新马史研究的贡献〉（2004）的单篇论文。而与南大中文系相关的专著或单篇论文却未有发现。

笔者所收集到跟中文系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对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研究，少数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一本研究拉曼大学中文系的本科论文。王润华和杨松年主编的《新马汉学研究：国大马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论文集》（2001）分别收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对两校研究状况的论文。马大中文系共发表了七篇论文。此外，陈徽治〈近十年来马来西亚汉学研究初探〉列出了九十年代马大中文系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专书出版和期刊论文这三方面的活动和成果。陈志鸿、林素珍、张惠思、祝家丰分别罗列了马大中文系对古典文学、现代文学

与马华文学、中国历史、哲学与语言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由于此书内容是研讨会的论文集，局限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对于本身中文系研究状况的探讨而非针对南大中文系。

由于注意到中文系研究的学者大多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服务，因此研究对象自然是马大中文系。钟玉莲于〈马大中文系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前瞻〉（1994）一文回顾了马大中文系创系的历史背景、中文系历年系主任与师资、中文系历年开办的课程、历届毕业生与在籍学生人数、硕博士研究生和历年学术活动。此外，也对马大中文系在学术定位及教育功能和环境演变趋势下的发展作出论述。而在中文系的课程、师资、经费等方面，钟玉莲亦对其往后该走的方向逐一说明。何丙郁〈回首当年：马大中文系初期〉一文提及马大中文系创系时候的点点滴滴，也对马大中文系的名称由来作出了详细解说。由于是一篇记录回忆的文章，内容仅止于描述一些事件，还未对马大中文系作出研究。许统麒是拉曼大学本科毕业生，其论文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研究（1963-2006）》（2007）。此论文作者很好地整理了马大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资料，但还能对其中的资料作出更进一步论述。此外，拉曼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谢美倩撰有《拉曼大学中文系研究（2002-2011）》，论述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历史、特色与贡献。纵观上述材料，已有学者耕耘马大中文系及拉曼大学中文系的研究，南大中文系则尚待开发。虽然上述的研究成果不是与南大中文系相关，但是研究新马华文高等学府中文系的文章仍能让笔者作一参照，故对笔者进行本论文研究有所助益。

钱穆曾写一篇文章名为〈我来马大中文系讲学后之感想〉（1998）的文章。由于此文是钱穆先生的感想，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但其价值就在于此文章道出了

中文系的重要性、中文系的课程编制应就何种意义而产生以及中文系肩负的责任和理想。郑良树在〈中文系和中华文化〉（2008e）一文中讨论了中国与台湾的中文系课程设计，并提出理想中的中文系应该扩展成为中国文化学院，里面包含经学系、史学系、子学系、文学系。郑良树也于〈华教·马华文学·中文系〉（2008d）这一篇短文中，针对马来西亚中文系课程的内容提出意见，认为中文系的传统学科内容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同等重要。此文说明了大马中文系课程的一些现象，但未做出更深入的研究以探讨其根本原因。此文也还未把此课题的探讨设定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这一点上进行论述。笔者可以运用作者的一些观点，配合新马华文教育的情况，以探讨中文系在此地应设制何种课程。

此外，黄文斌也在〈中文系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纵谈〉（2005）一文中，认为中文系开设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与传统中国学问并无冲突，反而更能让学生衔接中国古代学问，并提供参照经验，开创华族的未来。此文章虽思考中文系在马来西亚的一些问题，但尚未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具体的研究。劳悦强亦曾于〈学与术之取舍：新加坡近二十五年来汉学研究之发展〉（2006）一文中讨论中文系本科设计的基本问题。虽然是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为讨论对象，但其文章内容给予笔者很多启发，能够将之运用在思考中文系所面对的课程设制问题上。叶金辉曾向郑良树做过一个访谈，即〈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困境与反思——郑良树教授访谈录〉。其内容包含三个大方向，那就是郑良树的个人治学历程与风格、中文系的属性、汉学与国学的义界和马来西亚中文研究与当今汉学。这篇访谈纪录，无疑也是笔者对中文系课程设制的参考方向。

研究南洋大学的论著相当丰富，但注意到南洋大学的科系的研究甚少，至于专门以南洋大学中文系为研究主体者更是未有前例。虽然研究新马中文系的论著也为数不少，但大多谈及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或现今所存之中文系，尚未有研究者对南大中文系做过个案研究。目前与南大中文系最直接相关且较珍贵的史料便是由第一届，即 1959 年的毕业生于 1979 年所出版的《那晚在眉山》、相隔 20 年之后再成书的《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与 2009 年出版的《南大中文系离校 50 周年纪念文集》。这三本纪念性质的书刊有助于笔者了解南大中文系草创当时的细节、师生互动、系上活动等。通过书中著者的文章，笔者有如身置当年的中文系情景，并可深刻感受当时老师们对学生们的教导与影响。

至于华文高等教育相关的研究则有祝家华、安焕然主编《探索马来西亚高教发展路向》（2008）。此书是研讨会论文的集结，收录了讨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 8 篇华语论文和 4 篇英文论文。古鸿廷的〈马来亚地区华文高等教育发展之研究〉（2005）一文，借“南洋大学之创立与关闭”、独立大学筹建的失败、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的创立等华社重大的高教课题，论述华文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迁。作者特别点出三院都努力设立“中国语言文学系”，以维护华人文化传承这一点。古鸿廷也发表了一篇名为〈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创立之研究〉（2003 年）的论文。此论文探讨新纪元学院的创立背景、过程。此外，作者也分析了新纪元与董教总、马华公会、教育部和巫统的角色及互动。作者也一并道出了新纪元学院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曹淑瑶《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2010）一书的第二章探讨了战后初期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并在其中讨论南洋大学的设立。

而与新马中华文化相关的专著则有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2002）、黄文斌〈论马华文化的传承与文化人才的培养〉（2005）、颜清煌〈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2007）。这些资料有助于笔者了解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窥所谓中华文化究竟为何物。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观之，大致可以发现下特点。其一，有关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近乎于零，而有关南洋大学的研究则多以南洋大学历史事件或发展为主要论述，缺乏南洋大学个别科系的研究。其次，关于华文高等教育与文化承传关系之研究则多数是以民族忧患角度出发。若要证明南大毕业生的对承传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则应由探讨毕生在社会上的贡献才能较客观地说明他们在承传文化的贡献。简言之，以承传中华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南大中文系可说是一项新的尝试及研究途径。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南大中文系大发展概况，且还能了解中文系的课程设制将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看到毕业生在高等华文教育与承传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在论文书写的过程中，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论述，纵者乃南大中文系从上到下 25 年来的历史沿革，横者则是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生铺展开来。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以文献的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除了拉曼大学图书馆以外，笔者也曾到相关教育团体、机构或校友会，如华社研究中心、新纪元学院图书馆、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八打灵南大校友会寻找特刊、剪报、教育报告书、论文、专书等作为论文的参考资料。

笔者先细读有关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相关书籍，从中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背景。而南洋大学的特刊和史料是笔者主要参考的材料，如：《南洋大学创校史》、《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 1956-1966》、《纪念南洋大学创校 25 周年纪念特刊》、《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和历年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年刊》。以上第一手资料收录了南大历史各重要事件的剪报、照片、讲稿、报告书等等，使笔者在讨论研究课题时更能接近当时事件发生的情况，以分析及重现历史。

《南洋大学概况》和《南洋大学常年报告》，除了能让笔者从中了解南大历年的办学情况，亦可建构南大中文系的历史发展并了解课程的改制更迭。笔者根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整理出历届系主任览表、1956-1965 年历年教师名录、重大改制前后的课程表。笔者也把原始资料结合前人研究的第二手资料重新整理在传媒领域服务的中文系毕业生览表。

二、口述历史法

南洋大学成立距今约 60 年，时代相差不远，当时就读南大的学子许多仍健在。若遇有史料不足而需要补遗之处，笔者则进行访问，以毕业生的求学经历弥补史料不足。笔者曾到新加坡跟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林纬毅（1948-）进行访谈。从他的叙述中，笔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南大中文系当年的办学情况，帮助笔者建构论文。林老师更坦言由于受到中文系老师的学术熏陶，而奠定了他将来的学术之路。此外，林老师也很热心介绍系友们所从事的行业，让笔者在书写中文系毕业生的贡献一章有更明确的资料范围。

同时笔者也访问了梁秉赋以了解有关新加坡华文教育概况。梁老师亦提出若要论证南洋大学的贡献，建议以南大毕业生的出路和成就为论据。因此，梁老师提议使用问卷调查法，广发问卷给毕业生，以收集每位毕业生得资料，再从中整理及叙述毕业生的贡献。廖建裕在就读南大历史系前曾念过南大中文系，他对于当时中文系课程的负面评价，让笔者在收集资料和论述的过程中更加小心注意正面与负面的评价和资料，提醒笔者凡事不能只看正面。以华文高等教育及文化传承之关系的视角切入研究南洋大学中文系的个案，可说是一项新尝试的研究途径。

第五节 章节简介

本论文在章节安排上共有五个章。第一章为绪论，分别说明研究动机、研究范围、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章节简介。

第二章〈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成立与草创期（1956-1965 年）〉，笔者首先梳理新马中文系与中国、台湾中文系的渊源。笔者发现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所东南亚的中文系，其师资因历史导因都是来自中国或台湾的老师。此外，南大中文系的课程编制是参照中、台两地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随后，笔者简介新马华文教育背景，从中总结华社对于南大的建校需求是源于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师资、传承中华文化的需求。笔者在这一章也整理出中文系在初创的十年间所经历的沿革，着重讨论师资来源、课程设制、学会与出版的发轫，为讨论中文系毕业生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角色与贡献作铺陈。

第三章〈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全盛期与风雨飘摇期（1966-1980 年）〉首先对南洋大学与南大中文系中、后期发展作一概述。笔者发现 1966 年改制后，南大中文系的课程竟有八成的课程与《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相同，与 1965 年以前旧学制时期的课程相去甚远，多了许多本土化课程。中文系课程设制开始转型并涵盖本土化课程。至于 1974 年再度改制后的中文系则在内忧与外患的打击下面对发展困境。本章将就南大中文系的课程，观其对学生的培养，以论述第四章毕业生进而对社会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至于第四章〈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传承中华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将之分为教育与学术、传媒与文化、文学与创作、历史与政治共四个小节，以便探讨中文系毕业生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与贡献。南大中文系过去所培育出来的学子在学术界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学术人员人数的角度来看，中文系毕业生在 243 名学术人员中占了 39

名，可说相当吃重。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且成果丰富，而其中担任正、副教授者，任职学术行政职位者，皆不乏其人。涉足传媒领域的中文系毕业生也为数不少，上至总编辑下至记者或行政人员，报人们如杜南发、区如柏、欧清池和严孟达等，他们在承传中华文化的角色不可忽略。根据许万忠〈笔底生澜——南大写作人简介〉（2004：294）的南大写作人简略介绍，写作人的总人数为 219 人。文学院居冠，计 156 人，以系别分，中文系独占鳌头，共 88 人，占总人数的 41%，足见中文系在培养写作人才方面，成就卓著。这一批为数不少的毕业生分别在各自领域里起着承传中华文化的作用。

至于结语一章，笔者总结南大中文系学生所受到的熏陶及承传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也进一步讨论南大中文系对于现代新马的中文系有何借鉴作用。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面对了各种局限与困难。虽然有关南洋大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若针对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却须从前人研究中抽丝剥茧，寻找有关南大中文系的蛛丝马迹。有关南大中文系的第一手资料资料零散，储藏散落各地，要收集齐全实非易事。幸得已故王慷鼎教授（1936-2011）生前把经年累月收集的各种特刊和原始材料赠与拉曼大学图书馆，笔者才得以一览部分第一手资料。基于笔者并非全职念书，研究期间还得兼顾工作，要跑动各地查找资料也不容易。梁秉赋老师建议的问卷调查法实属一重要研究途径，惟笔者碍于研究资源和时间有限，加之南大毕业生散布世界各个角落，实难以一时达成这浩大工程。因此导致本论文尚有许多资料上的缺失，口述访问也极不足。冀将来有志于研究此课题者，不妨通过此研究途径建立毕业生的资料库。由于笔者学力不足，看待问题的眼光尚浅，写作与表达的能力有限，且对于问

题的探讨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学界不吝批评指正。希望日后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学者能够在此课题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章 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成立与草创期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以下简称新马¹）华文教育的发展，从私塾学堂、新式学校，发展至中学，再衔接至高等教育阶段，实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从南洋大学开办、独立大学的倡议、拉曼学院成立、三院（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学院）创立直到拉曼大学的创办，路途坎坷。目前马来西亚共有五所大专院校开办中文系。包括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学院。其他开办中文组的大专院校有博特拉大学（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大学（University Pendidikan Sultan Idris）与全马十六所师训学院。新加坡则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义安学院等开办中文系。新马地区的中文系得以发展其实与中国、台湾中文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第一节 成立背景

陈六使曾在谈话中称：“吾人所创办之大学，系完全按照中国历来办理大学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之规模及格式而创办之。（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4）”

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本是一家。1961年马来亚国会通过接受马来西亚概念。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赞成星马合并。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合邦成立。一个星期後（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击败了对手社阵，开始考虑进入联合邦发展其政治理念。在这个时期，李光耀一味在不同的场合里挑战马来特权，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不应分种族的。人民行动党参与了1964年的大马全国大选，派出了11名候选人，但只1人中选。1965年反对势力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在新加坡举行了反对党会议，成立“马来西亚团结机构”（Malaysia Solidarity Convention），与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打对台。行动党与巫统关系逐渐恶化，双方矛盾无法调和。1965年7月25日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度假时作出决定，新加坡於8月9日正式退出马来西亚联合邦（何启良，1998：80）。

1956年，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课，其师资多来自中国，开设的课程也与中国、台湾的中文系课程相似。这是因为1949年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纷纷离开中国，到香港、台湾甚至南洋等地。民国初期北京大学是一个学术风气自由的高等教育学府，当时有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支持共产主义的学者任教，同时也有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如胡适（1891-1962）与周作人（1885-1967）等学者。1949年以后，胡适便随国民党专机离开北京到台湾（〈北大简介〉，2013）。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余雪曼，便是其中一位同一波迁移者，他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于1950年在香港创建“雪曼艺文院”，（余定湘，2013）后于1956年到任南大中文系主任。由此可见，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渊源乃可溯源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中文系。

一、中国、台湾中文系渊源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立，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学门”于是成立。1912年，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9年，“中国文学门”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文学系”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中国文学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

文献专业，至此，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北京大学中文系简介〉，2013）。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是台湾最早创立的中文系。1928年，日本政府在台湾成立台北帝国大学，最初设文政、理农二学部。次年，文政学部“文学科”增设“东洋文学讲座”，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讲授内容，此即中文系之前身。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定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将原各“学部”改称“学院”，文政学部分为文学及法学两学院，“科”改称“系”。文学院初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中文系由此乃正式成立。当时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1901-1980）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划。光复初期，至中文系任教者有多位出身於北京大学。1948年以后，史次耘（1907-1997）、王叔岷（1914-2008）、李孝定（1918-1997）（此三位学者后来都曾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等陆续至台大中文系任教。1949年，傅斯年（1896-1950）出掌台大校务，傅校长与中文系教员等与北京大学关系极为密切；（〈台大中文系系所特色〉，2013）因此中文系颇能延续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学风，乃得以接续中国的“中国文学系”之学术传统。

台大中文系所聘得的教员学问各有专精，因得以让中文系在各个领域均有所发展，为草创时期奠定良好基础（〈台大中文系简史〉，2013）。教师将其在经史、思想、文献学方面，文学方面，语言文字方面之研究所得，开课讲授，造就各方面之人材，使学术传统绵延不绝。其中数位学者到任南大中文系之时，再把自身的学术经验带到南洋大学，惠泽新马地区的中文系学术传统。王叔岷先生对《史记》、《庄子》之校勘研究等；李孝定对於甲骨、金文、《说文》之研究都在新马撒下学术种子。王

叔岷、李孝定、史次耘、杨承祖（1929-）离开南大后，都回到台大中文系继续服务，（〈系所成员〉，2013）可证新马地区与中国、台湾中文系及师资渊源甚深。

二、新马华文教育背景

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社会的骨干，如果没有华文教育，中华文化无法在海外生根，而海外华人社会也就会丧失了它的本质（王秀南，1970：115-116）。私塾教育实乃华文教育之前身。新加坡在开埠之日，政权远操于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东印度公司及后来的驻印大总督，他们只热衷于经商而无心教育。在欧式学校未东渐之前，华巫先民早有其传统教育，即巫人之可兰经塾与华人的私塾。1829年，一位德国籍传教士汤生（Rev. G. H. Thomson）的记载，当时新加坡已有三间华文私塾（郑良树，1998：10-11）。但规模较大的，却始于1849年设立的崇文阁和1854年设立的萃英书院，以四书为课本，以方言为媒介。此外，富人自设家塾，或士子们径自设帐授徒的也不少（郑良树，1998：28-32）。可见当时的私塾林立，华文教育之基奠于此。

1867年起，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以海峡殖民地，直辖于英国的殖民部大臣。为企求贸易的扩充，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于是英殖民政府开始干涉各马来州属的内政，以教育作为其政治工具。因此自1867年起至1941年日军的南进，这一段战前的教育是政府接管教育的时期（王秀南，1970：119）。英殖民政府先从英校整顿入手，后从马来学校进行改革，并且经营印度学校。但是华校的情形却大相庭径，英殖民政府仅注重接管英、巫教育，却对华校教育进行放任政策。虽然殖民地政权由东印度公司而驻印大总督而英伦殖民部大臣，三易其手，但重视英文教育、扶植巫印教

育，而冷落华文教育的政策，依然保持不变。华人实迫于此，只好自力更生（王秀南，1970：123）。华人凭自身民族的力量，不依赖政府开垦与耕耘华文教育的现象，到了创办南洋大学之际，亦复如是。

1849年马六甲崇文阁由陈金声（1805-1864）带头创办，获得福建帮、潮州帮与侨生峇峇、新客移民的支持。它是超方言帮派、超土生新客所一致支持的一个计划，这罕见的现象说明除了医院以外，教育新生代是整个华社认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也说明为着教育新生代，华社早已拥有打破一切畛界而通力合作的优良传统（郑良树，1998：20）。新加坡萃英书院自1854年创始后，道南学塾、颜永成义学、毓兰书室、马车路尾义学亦相继设立。当日私塾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继而读幼学琼林、孝经，然后再读四书，纯用朗读及强记的方法背诵（王秀南，1970：124）。1881年，中国首任驻新领事左秉隆（1850-1924）到任，认为振兴文教乃护侨要道，鼓吹私塾大开文社，助长学风。

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应该始于1897年，即上海南洋公学设置外院，其后改名为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虽然规模甚欠理想，课程也依然保守，却是中国新式小学教育的滥觞（郑良树，1998：91）。马来亚新式教育起步于1904年，上距南洋公学外院的设置不过七年，可见马来亚侨社在华教方面的努力和奋进（郑良树，1998：97）。新马华文教育在1904年以前，尽是私塾与文社，檳城的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新马华文教育史新的一页，从而也鼓励其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尤其是新加坡，创建新式学堂的热潮接踵而来，私塾的中国式课程如背诵四书正式走入历史（颜清湟，2007a：170）。

清末现代化小学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建立替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颜清湟，2007b：410）。由于中国方面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失败，孙中山倡议革命运动，海外华人普遍认为新式学堂的设立有其需要。新加坡小学方面，崇正、养正两学堂，首创于1905年；应新、启发、端蒙三学堂，继设于1906年；道南、育英两学堂也于1907年及1910年先后成立（王秀南，1970：124）。女学方面，于1899年首创华英文并习新加坡华人女子学堂；专授华文的华侨女子学堂则设于1905年。马来亚小学方面，吉隆坡尊孔开办于1906年，怡保育才、吉隆坡坤成开设于1908年（王秀南，1970：34）。

中学是小学教育的延伸，当区域内新式学校以迅速步伐的步伐遍设各个角落时，中等教育的开拓就迫在眼前了（郑良树，1999：319）。新加坡中学方面，华侨中学首创于1918年，南洋女中、公教中学、中正中学等也纷纷继起，竞求拓展（王秀南，1970：125）。马来亚中学方面，檳城钟灵设于1923年，吉隆坡尊孔、怡保育才之中学成立于1924年，1927年吉隆坡坤成女中创立（王秀南，1970：34）。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文教育在东南亚取得相当的成就，大部分华文中学都是这时期所开办的。意即华文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形成华文教育的独立源流，这发展也为战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办铺平了道路（颜清湟，2007b：411）。

英国殖民政府一直到了 1920 年才正式管制华文学校。其管制也是由于感受到华校的存在可能威胁其政权，所以才加以管制。华校的学制、教师、课本、图书、仪器等全购自中国。加之华校接收超龄生，学生人数一向远超英校之上。自五四运动起，中国的新思潮逐渐遍及南洋，课本由文言变为白话，教学媒介语从方言变成国语（王秀南，1970：125）。英殖民政府见及此，始感到惊慌与担忧，才插手管制华文教育，于 1920 年颁行“学校、董事、教员注册法令”，以巩固其政权。接着，华校副提学司以及华校视学官也相继设立，以监督华校的设施。同时，英殖民政府也执行华校津贴条例（王秀南，1970：126）。此类种种都是英殖民政府加以管制华文教育的方式。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对新加坡投下第一颗炸弹，翌年新加坡沦陷。经此一战，新加坡学堂的所有校舍与设施皆毁于一旦或被日军征用。教育界人士不是枉被检证，失踪惨亡；便是远走高飞，藏避郊野；或改装小贩，街头摆摊；或舍学归农，从事耕牧（王秀南，1970：127）。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愿与日军合作，复课者少之又少，新加坡教育因此停摆。华人因战争而失学的教训，抛却过去不愿慷慨捐资教育的心理，为战后捐资兴学开启了方便之门。当陈六使（1897-1972）发出号召，宣布捐献校地之后，风声所播，益使新马各地华侨相应捐献，同时开始讨论筹组机构，准备效法当年抗日战争时筹赈的形式共同展开创校大业（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

1945 年日军撤退后，英殖民政府卷土重来，对新加坡和马来亚进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别委任提学司，负责两地的教育行政事务。1947 年，提学司尼尔逊（Neilson）提出“十年教育发展计划”，其建议是：一、各族男女教育机会均等；

二、免费的小学教育，以母语为教学媒介；三、学生家长可自由选择其教学媒介；四、各教育源流采用共同课程；五、强调技术及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王秀南，1970：129）。总括来说，尼尔逊是以提倡母语教育的立场出发，但却招徕误解与一些殖民地官员的反对。各源流“母语教育”公平发展，让家长们有权为其子女选择就读学校，使得华文教育在没有外力的打压下，得以迅速复校与发展（古鸿廷，1999：24-25）。

三、华社建校需求

1950年代，侨领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以衔接中小学的华文教育，促成三个阶段的完整教育体系。经陈六使先生振臂疾呼创校后，获得华社的热烈响应，于1956年成功开办。南洋大学之创办乃呼应当时的新马华社需求，因当时中国、英国与新马地区的政治环境局势所逼，南洋地区确实需要在此区域内设立一所华文大学。

“前此，全马来亚在籍学生，年达八九十万，属华语学校者半之，又其半分属英巫印语学校。华校教师多数来自中国，华校高中毕业生亦可随意赴中国升学。至是，教师之欲望其来诸中国者，日难一日矣，学生之欲赴中国升学者，可以去不可以归矣。虽曰新加坡有政府设立之马来亚大学在，顾收生有限，英校学生尚若不易问津，况华校耶？”（陈六使，1956：序一）

从陈六使的一番话中，可见建立一所华文大学实乃迫在眉睫的大事，南洋地区确实有此需要。

（一）完整的教育体系

战前，华文教育以小学为主，而后逐渐发展中学教育；战后，不但战前创立的中学近乎全都复校，许多新的华文中学也纷纷出现（古鸿廷、张晓威、曹淑瑶，2006：83）。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因素纷纷到南洋避难，中学师资骤增，这也制造开办中学的有利条件（颜清煌，2007a：184）。二战後新马两地华文小学和中学迅速复办，中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例如在马来亚联合邦内，于1946年至1957年这12年间华文中学从15间增长至60间，毕业生人数也从4508人增加十倍至49536人。

表二：马来亚联合邦华文中学学生及教员统计表

年份	学校间数	学生人数	教员人数
1946	15	4508	194
1947	22	3194	201
1948	21	3474	220
1949	27	4450	265
1950	32	5830	380
1951	38	7503	426
1952	40	11378	462
1953	45	14670	438
1954	38	18112	512
1955	54	32491	946
1956	70	40330	1037
1957	60	49536	1141

资料来源：（林水椽，1998：241）

1949年以前，许多高中毕业生都以升读中国大学为目的，本区华校学制、课程及语文等，也都依照中国教育制度来办理，一切学程都以升读中国高校为目标，随着大陆政权的转变，加上殖民地政府对共产思想有所保留，华族子弟深造的路子很快即告中断（郑良树，2001：216-217）。于是本地华人便认为自设华文大学有其必要性，以

便华文中学毕业生能够继续深造。虽然马来亚大学最终于 1963 年创设中文系，但始终解决不了华校生继续深造的需求与困境。陈六使于听取陈祯禄之报告和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大校长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1901-1981）与马大副校长薛尼（Sir Sydney Caine，1902-1991）之来函后，曾在回应中提及：“马来亚大学之历史，已有相当，范围并不广，目前九号位毕业生年有两千余名，马大尚无法容纳，将来九号位毕业生年增至四五千名时，马大究将何以容纳？”（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6）原因是以马大中文系提供的华文高等教育机会，面对人数众多的华文中学毕业生可说是杯水车薪。

1950 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无资格报考。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 1953 年 1 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并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以此衔接中小学的华文教育，促成三个阶段的完整教育体系。随后，陈六使代表福建会馆，宣布将裕廊路（Jurong Road）一块五百余英亩的地皮，献给华文大学，作为大学校址。此登高一呼，华社随之响应，反应极度热烈，办学款项纷至沓来（郑良树，2001：212-233）。

（二）培养师资

大学筹委会于 2 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有承担南洋地区华族文教重任的使命存在，亦有意作为南洋群岛中华

文化的最高传播站（郑良树，2001：230）。到了四月中旬，以陈六使为主席的南大筹备委员会，发表了〈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阐明创立南大的四大理由和二大特质。宣言的四大理由是：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之需要。两大特质则是：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1990：90-91）。从创办的宗旨来看，南洋大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华裔子弟的升学问题，显然地这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去考量。此外，第二项宗旨则是为解决华文教师荒。1949年以后，不仅华裔子弟无升学之路，来自中国的华校师资也一并被截断。为了延续新马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本区域内培养师资成为了当务之急。南洋大学的宗旨似乎皆是从现实需要去考量，但其背后尚隐藏着欲维护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理想。这一点就表现在两大特质之中。

（三）承传中华文化

在华人一片热烈支持声中，却有人发出异议。其中就有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爵士，他答复记者询问的时候，认为华人所办的大学“并无需要（创办南大）”，因为马大的中文系快要开办了（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虽然马来亚大学最终计划创设中文系，但始终解决不了华校生继续深造的需求与困境。其原因在于华校毕业生根本不具备进入马大深造的资格，又如何进入马大中文系。另外，马大中文系收生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华社子弟的需求。最重要的在于华社需要的是“华文教育”，而非仅为中文系一门学系。一个学系的效用，当然不足以和一间完整的大学相提并论（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

陈六使曾说：“吾人勿任令马华文化被消灭，且应维护及求进步，何以故？目前中学学生数以万计，每年毕业人数亦相当可观……吾人为维华人文化之长存，实则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二年前余已有此倡议，三年内办不成，则五年内一定要办成功，五年再办不成功，则马华文化之程度将日趋低落矣！”（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26）

胡文虎（1882-1954）认为这间华人大学将为公开性质，不论种族肤色及信仰，任何人均可入学，因为这并非纯粹华人大学，不过是马来亚华人所办理以应华人视马来亚为其家乡的需要，华人可利用此间大学以创造马来亚文化，此种文化非由抑制中华文化得来，而是由吸收中华文化，使其对马来亚文化有所贡献（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4）。

陈六使在动土典礼上说：“我们是在这片荒土上播下文化的种子，马来亚是英华巫印等族同住的乐土，华人须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的，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自认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7）由此可见，陈六使在华裔子弟升学问题上，已经考虑到将来文化承传可能后继无人的问题。因此，陈六使不仅从现实角度出发，也从民族的文化承传角度考量创办南洋大学。

第二节 初创期（1956年-1966年）

南洋大学于 1956 年 3 月 15 日，举行升旗礼，宣告正式开学，中文系也于同时开办。南大创始首个十年的学制参照中国、台湾四年制的办学方针，直到 1965 年方进行改制。南大创立之初，采四年制，每学年分上下学期授课，分设文、理、商三学院（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50）。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语言文学系、历史地理学系、经济政治学系和教育学系，共 5 系；理学院则设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和生物学系，共 4 系；商学院第一年课程附设于文学院。注册新生共 573 名，包括文学院 256 名，理学院 277 名，商学院 40 名（崔贵强，1994：279）。南洋大学中文系的英文名称为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华文名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本节将从师资、课程的更迭及学会与出版，共三方面论述南大创办首十年的概况。

一、师资来源

1956 至 1957 年度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为余雪曼（1909-1993），同年到校任教的有凌叔华、潘重规、贺师俊、王永祥、罗慕华（《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1990：174-175）。

余雪曼教授，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其经历：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兼代国文系主任，国立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研究所指导教授，国立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研究所指导教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研究所指导教师。余雪曼的重要著作有：《离骚正义》，《词学演讲录》，《诗文书画集》，《诗品疏证》，《诗史大纲》，《中国三千年书法大系》。他讲授科目则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诗史、词曲史、诗选、词选、曲选、楚辞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国学概论、文学概论、文学批评、读书批评、书画研究（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

潘重规教授，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其经历：教育部部聘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国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台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重要著作有：《文心雕龙研究》、《荀子笺证》，讲授国学概论、经学通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代文选、乐府诗选、文心雕龙研究（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

王永祥讲师兼图书馆主任，厦门大学文学士。曾任大厦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国立广西大学国文讲师、国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香港九龙孟氏图书馆主任，所讲授的科目包括：历代文选、国文、文字学、中国文法、读书指导、伦理学、中国文学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

凌叔华于 1956 年任教南大中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新文学导读、中国语法研究和修辞学等课程。1957 年闵守恒与黄念容（1904-1997）加入南大中文系师资行列。1957 年下半年，刘太希（1898-1989）应聘於南大，担任副教授，教授历代诗选

、诗经等课程。1958 年涂公遂（1905-1992）教授加入并担任中文系系主任。1959 年加入史次耘、嵇哲（？-1966）及两位助教，韩素音（1917-2012）成为兼任讲师，师资阵容再度壮大。筹创的四年间，师资阵容并无太大变化。

1956 年中文系原有教师 6 位，1959 年增至 13 位，1960 年共 6 位离职，属变动最大的一年。1960 年 4 月，南大举行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后，凌叔华于那年春季返回英国。同年潘重规、贺师俊、闵守恒、王永祥、黄念容也相继离职。由于离职人数众多，中文系便吸纳黄勳吾、郑衍通、曹树铭、李星可、张瘦石和仝道章，组成一组新生力军。南大中文系于同一年也聘用了三位毕业自中文系的助教，分别是翁世华、许统义、卢绍昌。

1962 年初，凡 1959 年以前任课教师已尽皆离职。1963 年至 1966 年，除助教先后出国深造及新聘教师外，旧有教师变动不大（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8）。从历年师资阵容可见南大中文系创系之初，由於师资的来源关系，其课程皆参照中国和台湾的传统文史哲科目。

二、课程设制

南大中文系草创之时，其师资多来自逃难到香港的中国学者。因此笔者认为南大中文系的办学受到中国中文系传统影响颇深。中文系课程，年来迭有更易，修订之工作每年都在进行。据中文系档案记载，中文系科目表于 1958 年、1960 年及 1965 年曾

分别作三次重大修订（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8），是以笔者乃据此为中文系课程的发展初期粗略地做出三个分期。

1956年3月11日，中文系主任余雪曼，为发扬中国文化，提高大学国文（当时本土认同意识尚不强，国文即今日之华文）程度起见，特主编《南洋大学基本国文》一书，选辑各时代之代表作品，凡56篇，作为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本。其中加上星号（*）者24篇，可供大学先修班、入学考生及高中三年级学生自修之用。余雪曼表示该书教材注重“知”、“能”、“养”三方面之平均发展。“知”者，在了解中国本位文化之特殊精神；“能”者，在欣赏历代文学作品之体裁、风格，吸取滋养，增进学者写作之能力；“养”者，在培养高尚品德，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此书课文由浅入深，始自当代，上溯周秦，共分九组，每组范文则以作者时代之先后为序。此书编定后，曾由文学学院院长张天泽（？-1969）、秘书长潘国渠（1911-1998）校阅，准备在开课出版（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203）。

大学上课时间定为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十二时半（共四节），下午二时至五时（共三节），总共为七节，在节与节之间，有休息时间十分钟。文学院学生，每学期应修完18至20学分，学分之核计，每周讲授一节之科目作一学分计（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223）。

开学第一个学期，文学院与商学院共同必修科是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国文即华文，共四学分，由余雪曼担任教授，采用余雪曼编的《南洋大学基本国文》一书。

中文系的两门必修科目都由余雪曼教授，分别是读书指导（2 学分）和国学概论（3 学分），另有选修科共 4 学分（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223）。中文系成立之初的原始资料匮乏，仅能从第一届中文系毕业生的文集得知首届同学曾上过的课程。

表三：首届中文系四年必修科目表

年份/学期	科目	学分	授课老师
第一学年（1956）上学期	国文（华文）	4	余雪曼
	英文	4	林我将
	中国通史	3	余协中
	中国文学概论	2	余雪曼
第一学年（1956）下学期	国文（华文）	4	潘重规
	英文	4	林我将
	中国通史	3	余协中
	中国文学概论	2	余雪曼
	国学导读	3	潘重规
	新文学导读	3	凌叔华
第二学年（1957）上学期	历代文选	3	闵守恒
	中国文学史	3	余雪曼
	中国文字学	3	潘重规
	中国语法研究	2	凌叔华
第二学年（1957）下学期	历代文选	3	闵守恒
	中国文学史	3	余雪曼
	中国文字学	3	潘重规
	修辞学	2	凌叔华
	历代诗选	6	刘太希
第三学年（1958）上学期	论语	2	涂公遂
	史记	2	潘重规
	各体文习作	2	刘太希
	哲学概论	2	范锜
第三学年（1958）下学期	论语	2	涂公遂
	史记	2	潘重规
	各体文习作	2	刘太希
	哲学概论	2	范锜
第四学年（1959）上学期	经学通论	2	涂公遂
	声韵学	2	潘重规
	文学批评史	2	贺师俊
	专书选读：诗经	2	潘重规
	专书选读：春秋左传	2	史次耘
第四学年（1959）下学期	经学通论	2	涂公遂
	训诂学	2	潘重规

	文学批评史	2	贺师俊
	专书选读：诗经	2	潘重规
	专书选读：春秋左传	2	史次耘

资料来源：（胡笏，2009：132-133）。

（一）第一次课程修订（1958年）

目前能见之最早的课程表乃 1958 年修订之后的课程。当时的南大学制分四学年，每学年分上下两个学期上课。由于课程表之中并没有详细说明选修科目的学分如何计算，因此笔者初步推算中文系学生需得至少修满 132 学分以上方能毕业。中文系学生四个学年的必修科共 100 学分。

一年级（30 学分）：中文、英文、中国文学概论、各体文习作、国学导读、新文学研究

二年级（28 学分）：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中国语法研究

三年级（20 学分）：专书选读（一）、专书选读（二）、中国哲学史、词选、曲选

四年级（22 学分）：经学通论、专书选读（三）、专书选读（四）、声韵学、中国文学批评、训诂学、研究报告

（专书科目包括易经、书经、诗经、论语、左传、礼记、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楚辞、文选、文心雕龙、诗品、专家文、专家诗、专家词。）

中文系的选修科目如下：

一年级：中国通史、中国书法

二年级：修辞学、中国文化史、中国小说史、新文学导读、四书、中国戏剧研究

三年级：翻译学、哲学概论、日文、校雠学、乐府诗、唐宋文、唐以后文学史、古文字学、中国史诗、中国词曲史、诸子文选

四年级：目录学、美学、骈文、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中文教材与教学法

从 1958 年的课程可发现南大中文系对学生的训练着重于文学、哲学与小学（声韵、训诂、文字学）的训练。

（二）第二次课程修订（1960 年）

1956 年 5 月 1 日，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Daul Marshall，1908—1995）在伦敦述职，教育部部长周瑞麒即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南大未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的法定权利前，南大学位不受承认。1957 年 11 月 13 日，南大行政委员会致函新加坡政府，建议聘请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评鉴委员会，以审定大学的学术水平，并表示南大准备接受相关的调查结果。从 1959 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报告书缠绕着南大。

1959 年白里斯葛（S. L. Prescott）的《南大评议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1959）出炉，对南大行政、组织、课程、教职员、学生生活和考试等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李业霖，2002：59—83）。1960 年 2 月，魏

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eview Committee) 出炉，评议南大的行政、财政、教职员、课程、设备、学生和法令，建议进行改组（李业霖，2002：195-206）。

1959 年，南洋大学与政府同意聘请白里斯葛等人对南大的学术水平进行评鉴。

《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由白里斯葛(S.L. Prescott)领导，与洪卫廉(William Hung)、谢玉铭(Hsieh Yu-Ming)、钱思亮(Chien Shih-Liang)和胡思威(A.F.P. Hulsewe)共同组成评议会。评议会分别由美国、英国、中国及荷兰的大学传统的各委员所组成（李业霖，2002：60）。

评议会于查阅南洋大学课程后，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南大的课程仍需大大改良。课程的缺点之一便是太过繁重。依照南大规定，文、商科学生必须得到 142 学分，理科生则需 152 学分方能毕业（实际上理学院的学分已于 1959 年 7 月改订为 136 学分），比美国（文、理科 120 学分，商科 128 学分）、中华民国（文、理、商科 132 学分）以及菲律宾（文、理科 120 学分，商科 121-123 学分）的大学高出不少。评议会建议把学分减少至 128 至 132 之间（李业霖，2002：75）。

评议会坦言在评议中文系时面对困难，因为当时的他们仍未有世界公认的标准以衡量中文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他们认为该系的许多教授对古典文学及文学传统有着广博的认识。但是，评议会由该科大纲来看，中文系没有充分注意近代学者的研究（李业霖，2002：77）。评议会仅提出中文系偏重古典文学的课程而忽略近代研究。评议

会实际上并没有针对此现象作出更详细的改革建议。整体而言，这份报告书对于南大中文系的课程没有带来太多影响或转变。

在白里斯葛的报告书出炉后，教育部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检讨这项报告，以研究大学改组的程序与范围。《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960年）则是魏雅聆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乃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黄丽松、廖颂扬、连士升和 B. R. 史林尼哇山。该报告书认为分配给一年级学生的学分过多，学科科目方面的分门别类过于细致，致使学生模糊于细节中而未能清楚地把握在广大范围上的基本概念。因此，评议会建议首先把一年级的必修学分减少，其次把必修学科重新调整，以编成较少的科目而又涉及更广大的范围，并认为这种办法尤为适合用于文学院和商学院的课程（李业霖，2002：201）。

根据南大注册处 1960 年编印的《南洋大学科目表》（南大注册处，1960：1-2），中文系的必修科目如下：

一年级三门：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新文学

二年级五门：文字学、语法、文学史、诗、小说

三年级五门：修辞学、中国哲学史、词曲、戏剧、楚辞

四年级两门：中国文学批评、诗经

这套课程的各级科目安排循序渐进，重点显然在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训练（劳悦强，2006：177）。从这一年的课程可见一年级的三门课均是大范围的语言与文学概

论。四年课程的教学重点偏重于语言和文学，而非历史、哲学或本地研究，笔者认为有数项原因。其一，其时南大已有史地系；其二，师资的研究领域专长在于语言与文学；其三，本土化意识尚未抬头；其四，为培植中学华文师资。

《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仅改变和调整中文系的课程范围与各科目的教授顺序，并未对整体课程提出改革。1961 年中文系课程在报告书出炉后仅有些微调动，增开了三年级选修科“钟鼎文”与四年级选修科“甲骨文”两科，取消四年级选修科“经学通论”和三年级选修科“近代文学作法”两科（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8）。总括而言，《1959 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与《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曾对中文系课程作出些微建议，但不至于改变南大中文系源自于中国与台湾中文系传统的课程。

1962 年之课程，大体与 1961 年相同。1963 年除恢复“应用文”为二年级选修科，改“训诂学”为全年 4 学分，重开“论语”与“孟子”二科外，课程亦大致如旧（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9）。

（三）第三次课程修订（1965 年）

1964 年课程之修订工作，于前任代主任张瘦石任内筹议经年，至 1965 年一月间文学院院长张德召兼代中文系系主任时始修订完成，即根据新课程开课（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9）。同年年底，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

告书》(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1965) 公布,对中文系课程提出了修改建议。

1965年初,中文系每学年必修科定为四科。此外,一年级的选修科目取消,更易为文学院必修科目。文学院必修科目分别为:中文、巫文或英文必修一科、文学概论、于文学院必修科目中任修一科。

中文系必修科目:

一年级:四部概要、语言学概论、新文学、专书选读(论语或孟子)

二年级: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语法或小说必修一科、专书选读(左传、礼记、史记或汉书)

三年级:声韵学、修辞学或戏剧必修一科、诗选、专书选读(尚书、诗经或楚辞)

四年级:训诂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哲学史、词选

选修科目:

二年级:唐宋文选、新文艺习作、华语语音学、图书馆学

三年级:应用文、古文字学、中学中文教材教法、专书选读(集部书选)

四年级:校勘学、曲选、专书选读(子部书选)、语文专题研究

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出炉前,中文系课程仍旧沿用传统中文系课程,并未将课程本土化,增设有关新加坡或马来亚文学、历史或文化的相关科目。

1965年1月20日，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适应新需要”为由，聘请王赓武等人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应兴革之事项（胡兴荣，2006：75）。委员会由王赓武（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则有许少治（新加坡工艺学院讲师）、林和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孔贵（南洋大学商学院代院长、会计系教授兼系主任）、卢翟（新加坡教育部总视学官）、汤寿柏（马来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王叔岷（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秘书许统义（南洋大学图书馆代主任）。委员会的检讨范围为“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李业霖，2002：310）。前两份报告书与这份报告书最大的分别在于此报告书乃校内行政机关决定进行的评鉴，非如之前乃系由政府介入建议。然而这一份报告书所带来之影响却远远超出前者。

在“关于语文的建议”一章，委员会建议应停办语言文学系，改设语言中心，负责教授南大所有初级及中级语言科目，其中包括国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以及其他语言。至于马来语及华语高深科目，则需与有关学系共同开设。委员会同时建议汉学系应继续开设华文的高深科目，并做出课程修正（李业霖，2002：312）。

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9月11日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公布，建议改组南大、建立新学制、增设新课程，要求南大招收各源流学校的学生。其中也提出建议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委员会直接认为中文系应为汉学系。委员会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且须照顾到社会的各种需要。委员会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中文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的语言条件，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

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委员会希望中文系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谐方面将有所贡献，因此南大得考虑将中文系改称为汉学系（李业霖，2002：319）。

该委员会建议增添在中文系的科目包含历史系、地理系、公共行政系和经济系的课程。从建议施行的课程表来看，委员会将中文系课程内容加以改革成汉学系课程内容，并且将本土化研究纳入中文系。其中一年级的课程将加入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Sociology I、Economic Analysis I。二年级则有一门东南亚华人历史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三年级的选修课包含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y of Malaysia、History of Modern Japan、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Geography of East Asia、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1966年4月25日，新学年开始，对一年级新生实行新学位学制，二年级以上学生仍按旧制上课。值此过渡时期，中文系旧生仍采用旧制课程，新生则根据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所建议之课程修读（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9）。新学制分“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两种。“普通学位”采学分制，学生凡修满108学分，即可获得学位，通常应于三、四年内修毕，如超过五年而未能修满所需学分，则不得授予学位。“荣誉学位”不采学分制，凡三年内持有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者，得攻读荣誉学位，考试合格后依成绩分别授予三个等级学位，即一等荣誉学位、二等（甲级）荣誉学位、二等（乙级）荣誉学位（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

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9）。此学制替代南大原有的四年学士学位课程，英国大学体制从此纳入南大学制。

三、学会与出版的发轫

中文系创办不久，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即诞生。它是以南大中文系为基础的学会，会员均源自中文系学生。南大中国语文学会（简称中文学会），是南大最早成立的一个学会，它的前身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简称中研会），创立于1956年6月7日。从1956年的成立至1958年间，会长一职由系主任兼任。从1959年开始，会长一职方由同学当中选出。1960年，为配合“中国语言文学系”之名称，改“中研会”为“中国语文学会”。同年4月，创立“马华文学资料室”（南洋大学中文学会、诗社、大众传播学会——港台菲文化考察团纪念特刊编委会，1979：13）。

1957年，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以手写印刷的形式出版《中国艺文》创刊号“纪念屈原特辑”，凌叔华写了《发刊词》，推崇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真挚动人的作品。1959年起，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了排印的《大学青年》刊物，一直维持到1963年，共出版10期（南洋大学中文学会、诗社、大众传播学会——港台菲文化考察团纪念特刊编委会，1979：13）。

南大中文学会还在1959年12月出版了第一期《中国语文学报》年刊，至1961年共出版三期，其后又在1968年至1976年间继续出版共八期。作者几乎都是中文系

的老师，有涂公遂〈诗与政教〉、潘重规〈亭林诗钩沈〉、黄念容〈文选黄氏学〉等论文，显然采取的是义理、考释、训诂等国学研究的途径。

1962年，《南大中文学报》出版，刊载中文系师生的学术论著。1964年初，中文系在改进大一中文教学新计划下，编印《南洋大学中文选》一书，甄录所及，自先秦以迄近代，凡50篇（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9）。同年，中国语文学会出版《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发展》，可见当时中文系已注意到马华文学的研究。

1959年南大开课仅第四年，中文系便出版《中国语文学报》，随后于1962年《南大中文学报》出版。这两份学报专载中文系师生学术论著之刊物。而后南洋大学应十周年校庆，出版纪念论文集，《南洋大学学报》应运而生。

《南大中文学报》为纯学术性刊物，以中国之语言文字、文学及哲学等为研究对象。此年刊的出版旨在让研究者各抒所得，互相切磋。所有文艺作品而非研究性质者，一概不录。《南大中文学报》一年只出刊一期，出版日期及篇幅的多寡，均无一定。笔者目前所见之学报出版三期，第一期于1962年12月30日出版，第二期于1963年12月31日，第三期则是1965（后页英文目录写1964）年2月28日。第一期和第二期皆由钟介民主编，第三期则由张瘦石主编。

第一期所收录的论文，作者均是系上的教授、讲师或学生，共 9 篇论文，厚 218 页，从右到左直行排版。其中六篇论文由教师发表，三篇作者为中文系学生。论文的研究内容侧重于诗词和文字语法。

表四：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年刊：第一期《南大中文学报》目录（1962 年）

姓名	职位	论文题目
高鸿缙	中文系教授	大孟鼎考释
张瘦石	中文系副教授	文言“所”字语法之研究
郑生	中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	大学篇管窥
黄勳吾	中文系副教授	词的体调及其作法
葛连祥	中文系讲师	有关诗的几个问题
曹树铭	中文系讲师兼副校长室秘书	李白清平调修辞与作法之分析
翁世华	中文系助教	两周金文词之研究
苏新鏊	中文系毕业同学	老子考述
谢世涯	中文系学生	李煜词研究

第二期共收录 11 篇论文，厚 218 页，排版与上一期的方式毫无差异。第三期也收录了 9 篇论文，厚 214 页。所发表的论文研究范围依然集中在文学、文字学和哲学方面。《南大中文学报》比《南洋大学学报》更早发行，显示中文系在学术方面的重视与所具的前瞻性。

表五：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年刊：第二期《南大中文学报》目录（1963 年）

姓名	职位	论文题目
钟介民	中文系系主任	说“中”
陈铁凡	中文系教授	敦煌本虞书校证
黄勳吾	中文系副教授	曲艺概说
朱兆祥	中文系副教授	厦语音韵的检讨
孟瑶（杨宗珍）	中文系副教授	越剧与传说
葛连祥	中文系讲师	拜伦哀希腊诗中译之比较
向夏（黄六平）	中文系讲师	“小”义之受义根源悬解

卢绍昌	中文系助教	诗经拟声词之研究
翁世华	中文系助教	两周金文词类之分析
林源河	中文系助教	论语新义
苏新鍈	中文系助教	老子考述（续）

表六：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年刊：第三期《南大中文学报》目录（1964/65年）

姓名	职位	论文题目
陈铁凡	中文系教授	敦煌本夏书斠（校）证
苏雪林	中文系教授	离骚的西海与不周山
向夏（黄六平）	中文系讲师	章氏庄子解故订
葛连祥	中文系讲师	韩非思想述评
林源河	中文系助教	荀子义辨
苏新鍈	中文系助教	庄子年里考
张瘦石	中文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	文言“所”字语法之研究下篇
张瘦石		词曲宫调与乐律
谢德燕	中文系应届毕业生	诗词曲音乐之研究

从南大中文系出版物的发轫，我们可以看到中文系创系之初对汉学研究的蓬勃。南大中文系可说是新马地区汉学研究的滥觞，其研究的内容包括文字、文学、哲学、思想。如前所述，中华文化的核心乃高深之文字、文学、哲学、思想，须有受过训练的文化人才加以研究方可达至文化之深耕与承传作用。

在南洋大学的效应下，我们观察出本区中华文化的确迅速飞扬。就以文学作品来说，从创办南大的第一声号角由陈六使吹起之后，马华文学无论从质和量来说都在增加增长。²南大的写作人在此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毕业自中文系的人数更是占有很大比例。

² 实际统计数量可参考（郑良树，2008(a): 152）。

华人民族之所以为华人这一民族乃因中华文化内蕴在其中。文化的传承须由教育开始，南大创立的其中一个重要考量点便是承传中华文化。从探讨南大中文系与中国、台湾中文系的渊源，我们可见南大中文系所需肩负的中华文化遗产重任。继而从新马华文教育背景，我们便可得知南大创立对于华社的重要性。从南大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我们亦可见中华文化的精髓都深植其中，潜移默化至学生的思维中。通过参与系学会与出版活动，这些学生又从中汲取了哪些养分？本论文第四章将讨论这些师资、课程、学会与出版的训练，栽培了哪方面的人才，这些中文系毕业生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三章 南洋大学中文系发展与演变（1966-1980年）

第一节 南洋大学与南大中文系发展概述

1965年1月20日，临时校内委员会聘请王赓武教授等人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急应兴革事项。2月11日政治系主任兼代注册主任黄应荣博士应聘为第一任署理副校长，同时兼代副校长职务，开始从事改革行政组织及调整课程等工作。另一方面，王赓武教授等人课程审查委员会于5月14日完成报告书。9月11日，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建议南洋大学建立新学制，除普通学士学位外，增设荣誉学位课程；实行新课程，以使南大能够收容所有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增设马来学系，设立语言中心，建议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提高教师待遇并提供充分研究机会与设备，以提高学术水准。

1966年，南大准备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进行改制。4月25日新学年开始，二、三、四年级学生仍按照旧制上课，一年级新生则实行新学位制。新学位制分为“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两种。前者采用学分制，凡学生修满108学分，则被视为合格获得学位，通常应于3、4年内修毕。如经过5年而未能修满108学分者，不得授予学位。荣誉学位则不采学分制，凡在3年内获有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学生，得攻读荣誉学位，考试合格后依成绩分别授予一等荣誉学位、二等（甲级）荣誉学位、二等（乙级）荣誉学位。

在渡过了 1965 年最后一波学潮，学生会被关闭后，南大校方实行王赓武报告书建议更改学制，南大发展逐渐上轨，发展至全盛时期。1965 年至 1975 年这十年间的学生人数稳定，教师资源亦相当丰厚。中文系系主任从 1965 年 8 月起便由李孝定担任至 1970 年 4 月。随后由文学院院长萧庆威代理半年。1970 年 10 月，系主任一职由皮述民出任至 1975 年 6 月。李孝定于 1975 年再次接任系主任至 1978 年退休回台。1965 年之后十多年的中文系系务固定由两位主任担当，并无太大的人事变动，对中文系的稳定发展有其益处。1964 年学年度改制前，南大中文系的一年级只有 24 位新生注册，1965 学年度新生 29 名，相信是受到学潮影响。1966 学年度改制开始，学生会被关闭后，学潮平静下来，中文系一年级新生人数再度回升至 52 人，1967 年度更攀升至 67 人，直到 1974 学年度为止，中文系一年级新生人数都维持在六、七十人左右，1972 学年度更高达 92 人。

1969 年 4 月 14 日，黄丽松博士应聘出任南大校长。第一届新制学生毕业，同时标志着旧制不分等级的四年普通学士学位学制的结束。1970 年 3 月，南洋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分设亚洲研究院、商学研究院、数学研究院及自然科学研究院。1972 年 9 月黄丽松博士任期届满，辞谢校长职。大学理事会延聘薛寿生教授出掌南大。同年 11 月，新加坡教育部政务部长蔡崇语在南大主持“大学毕业生就业研讨会”开幕礼时致词透露：南洋大学遵照新加坡政府“配合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由 1974 年起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如此一来，这项政策已违拗南大创办宗旨，杜绝了大马华校高中毕业生前往南大深造之途，引起大马文教、工商界的强烈反应。由 1974 年起，南大停止单独为外国学生举办入学考试，大马持有剑桥高级中学会考证书或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毕业生，可向南大或新大提出入学申请。

同于 1974 年，南大校长薛寿生（1926-）教授透露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更普遍应用英语。南大准备由 1975/76 学年起，尽量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1975 年 3 月，新加坡总理署发表文告，宣布原有校长薛寿生教授三年任期届满，改委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兼任南大校长。同年 6 月，李昭铭校长宣布南大从本学年开始，在人事、学制、课程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改革是在教学媒介语方面，从这学年开始，南大除中华语文科目外，其他学科全部改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以贯彻新加坡政府“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的教育目标。1976 年 8 月李昭铭校长开始告假，南大理事会委任吴德耀教授（1915-1994）为代理校长。一年后，吴德耀卸卸代理校长职，南大从这时起没有校长。

李光耀（1923-）在南大历史学会一次演讲中指出“南大改革为用英语媒介的大学，所遇到的障碍，在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认为南大生必须全面浸入才能掌握英文”（傅孙中，1982：31）。李光耀的讲话成了南大与新大建立联合校园的基础。1978 年 3 月，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这两间大学共同联合课程的联合校园，让南大学生能够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准，希望藉此消除某些私人界对南大生存有的偏见。

1980 年 3 月，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1929-），提出南大今后命运的问题。他基于两点理由，一即南大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师资及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并在丹顿报告书的基础上，建议南大与新大进

行合并。同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毕业生领取南大文凭。于此南洋大学走入历史。

南洋大学初创时所发表的宣言包括四大理由和两大特质，宣言的四大理由是：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之需要。两大特质则是：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1990：90-91）。这显示了当时新马两地人们对南大的期待，希望这所高等学府能成为华文教育最高的一环，为华社、华人民族文化在这片土地的承传贡献一分力量。随着新马两国时局的发展，大学的改制实无可避免，南大中文系也必受影响。中文系课程不断进行调整与变化，在不同地域必有不同于中国、台湾中文系的课程设制。课程的调整与变化带来的未必是全盘负面的影响。一个科系的课程设制有许多不同的考量点，南大中文系首要考虑的就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南洋。不同地域便有不同的文化，当华人南来到这片土地时，便已知华人自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必会产生融合。同样的南大中文系课程设制也必与中国、台湾的课程有些微差异，这便是笔者所想要探讨的中文系课程本土化转变。若回头看看南大的创立宣言，中文系课程本土化其实正呼应了南大创立的初衷。

第二节 课程转型与本土化

1964年以后，南洋大学出现一连串革新。先是1965年1月20日，南洋大学聘请王赓武（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叔岷（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汤寿柏（马

来亚大学物理系主任）、许少治（新加坡工艺学院讲师）、林和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卢曜（新加坡教育部总视学官）、刘孔贵（南大商学院代院长、会计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许统义（南大图书馆代主任）组织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急应兴革事项，并于同年 5 月 14 日完成报告书（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9）。此报告书建议南洋大学建立新学制，实行新课程，各学院若干学系应作适当调整，增设马来学系，设立语言中心，并且增高教师待遇。

在课程审查委员会进行考察的同时，1965 年 2 月 11 日，常务理事会议决聘请政治系主任兼代注册主任黄应荣博士为第一任署理副校长（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9）。黄应荣就职后，便着手从事改善行政组织及调整课程等工作。

1966 年 4 月 25 日，新学年开始，二、三、四年级学生仍按旧学制旧课程上课，一年级新生则实施新学制。南洋大学实施的新学制课程，分“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两种。“普通学位”采学分制，学生凡修满 108 学分，即可获得学位，通常应于三、四年内修毕，如超过五年而未能修满所需学分，则不得授予学位。“荣誉学位”不采学分制，凡三年内持有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者，得攻读荣誉学位，考试合格后依成绩分别授予三个等级学位，即一等荣誉学位、二等（甲级）荣誉学位、二等（乙级）荣誉学位（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9）。此学制替代南大原有的四年学士学位课程，英国大学体制从此纳入南大学制。

南洋大学为配合新学制课程之实施，于 1966-67 学年度之第一一年级起，开始实施指导研讨制（Tutorial and Seminars）。一年级各项课程，除教师讲授外，将各院系各科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数以不超过 15 人为原则，由任课教师或指定导师负责指导，师生按时参加，以从事研讨（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29）。此研讨小组之实施，在于培养学生之研讨精神，及督导学生之进修与增进师生间之教学联系，并训练学生对学术问题具有自我表达和分析判断之能力（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29）。

南大中文系也于同年实施新学制。同年底，南大宣布《南洋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学科考试办法》，规定“学科考试使用文字：中国语言文学系各学科及中国史地等学科，均使用中文；语文各科，则使用其所授之文字；其他各学科，各生于中英文可自由选择”（南洋大学 1966-67 学年度第十次教务会议记录，1966：4）。中文系的教学媒介语并未受此次的改革影响。

王赓武带领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关于语文的建议”一章，建议应停办中国语言文学系，改设语言中心，负责教授南大所有初级及中级语言科目，其中包括国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以及其他语言。至于马来语及华语高深科目，则需与有关学系共同开设。委员会同时建议汉学系应继续开设华文的高深科目，并做出课程修正（李业霖，2002：312）。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直接认为中文系应为汉学系。委员会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且须照顾到社会的各种需要。他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中文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的语言条件，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

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委员会希望中文系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谐方面将有所贡献，因此南大得考虑将中文系改称为汉学系（李业霖，2002：319）。

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其实正考虑如何让南大的课程适应本土。因为学生所学的课程若与本土生活经验结合，才能达到对这片土地认同、对这个国家效忠的功能。文化是不断演变的，这样的文化调整在短期之内会受到冲击。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核心，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化的思想与价值观。核心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文化的表征。文化表征的改变能让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适应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在那里继续茁壮成长，长期发展下来经历转变的文化必会回归本质。

王赓武报告书出炉后，中文系的课程是否有做出相应调整或是保留原来面貌？笔者尝试以 1965 年（改制前）、1966 年（新学制始）、1970 年（新学制全面实施）的课程表以及王赓武报告书所建议之课程作比较，以一探究竟。

从 1965 年（改制前）、1966 年（新学制始）、1970 年（新学制全面实施）的课程表与王赓武报告书建议之中文系课程表比较，可见此份报告书对中文系课程之影响甚巨。³中文系的必修科目之中，依然保持着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小学等课程。中文系的课程编制把其他如马华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科目，都编入选修科。南大中文系尝试把中文系与汉学系课程作出融合，游走在传统与革新之间。

³ 详见附录表三。

改制前的中文系课程是传统中文系课程之说，可从 1965-66 学年度的课程表显而易见。1965-1966 学年度的中文系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科目。一年级的必修科目有：中文、四部概要、语言学概论、新文学、专书选读（一）；二年级的是：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语法、小说、专书选读（二）；三年级则有：声韵学、修辞学、戏剧、诗选、专书选读（三）；四年级有：训诂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哲学史、词选。不仅从必修科目来看，选修科目⁴也在在显示了南大中文系在课程进行大改制之前，确实以中文系传统课程为重。

1966 学年度起，王赓武报告书出炉后，南洋大学采取新学制，各院系所列课程均为新制，而其余各年级则仍依旧制。

表七：南大中文系必修科目表

年 级	1965/66 (改 制 前)	1965 (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 程)	1966/67 (新学 制始)
一	中文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现代中国文学
	四部概要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un Yu & Meng Tzu)	中国古典文学 (一)
	语言学概论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史
	新文学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东亚通史
	专书选读 (一) 论语或孟子	Malay I / 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马来文
	文学院必修二科 (见附录六)	—	—

⁴ 详见附录表三。

表八：南大中文系选修科目表：

年 级	1965/66（改制前）	1965（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程）	1966/67（新学制始）
一	无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	Reading in Chinese Prose	中国散文选读
	—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东南亚近代史
	—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概要
	—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政治学概论
	—	Sociology I	社会学（一）
	—	Economic Analysis I	经济分析（一）

根据上表，笔者发现南大中文系在 1966/67 学年度的一年级新课程无论是必修科目或选修科目都完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所建议之课程进行改革。虽然目前无从得知其实际执行的课程有多少，但一叶知秋，中文系的课程转型是必然的。

中文系课程的转型并非突然的转折，事实上课程转型的背后还涉及各种政治、社会、认同、文化等复杂因素，其中最首要的就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政治演变因素。随着各种历史导因如国家政局与政策、华人国家认同、国家文化建构，这些外在因素的渗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课程也必须随之改变。要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保存中文系的原来面貌，不失传统，又能迎变革新，实是新马中文系所面对的最大考验。南大中文系课程的转型实是一早就已揭示了中文系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发展方向问题。

南大中文系课程的本土化课题必须注意两个不同国家与不同的政治局势。其一，南大创办于 1956 年，当时它还是属于马来亚境内的高等学府，要讨论这一时期的南大

就必须注意这个时期的马来亚，王赓武报告书也是在这一政治局势的考量下出炉。王赓武曾说明“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该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加坡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李业霖编，刘宏，2002：392）。此份报告书的前提是为迎合马来西亚（当时包括新加坡）这个新兴国家成立后所需作为考量点，因此报告书所建议的课程具有本土化倾向也是自然之事。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因为政治局势的不同而废除这份报告书，反而依旧采纳和执行报告书的建议内容。其次，新加坡于 1965 年退出马来亚，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国家建构上，新加坡政府的考量点与政策自然和之前有别。这一时期的南大则必须在这个局势之下来讨论。

二战后初期的十余年间，正好是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即由认同于中国转移到认同于居留地（崔贵强，1989：1）。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这 20 年间，当时的国内与国际政治局势相当复杂，英殖民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威胁国家安全，政府颁布紧急法令，成立新村以杜绝乡区居民支援马共斗争。而后，马来亚刚从英国殖民政府手中争取到独立，华人在认同上逐渐本土化，其中语文、公民权、教育等政治议题都还在争论的阶段。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程本土化的考量点可能是要解决 1960 年代一个新兴国家所要培养的人才。在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需是具有国家意识、认同本土并能效忠国家。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了中文系课程本土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二战以后，华人社会产生极大变化，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趋向薄弱。自 19 世纪末以来，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与强壮，在二战前达到巅峰。当时大

部分华人都以“华侨”自居，把海外当着暂时的居留地（颜清湟，2007b：413）。1957年，马来亚从英殖民手中独立，马来亚地区华人面临重大抉择，必须在中国与马来亚之间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效忠对象。由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到新马地区的华人与中国关系被阻绝，他们无法回国探亲，也无法到中国升学。因此新马地区华人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身份认同已逐渐产生转变。

战后海外华人逐渐了解到居留地的重要，这意识反映在教育和文化上。战前，海外华文教育被视为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环节，海外华文学校被视为中国学校的翻版。一般华文学校的课本和教材都由中国供应，当时书本所灌输的也是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效忠中国的观念。随着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出现，华文教育也逐步本土化，课本的编写和出版由当地出版公司负责，课本的内容以居留国和邻近区域为主，所灌输的爱国主义是以新兴的独立国家为对象而非中国（颜清湟，2007b：416）。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钟玉莲曾在《马大中文系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及，当时为创系而成立的课程研究委员会建议“这个学系的课程，不应该全部取向于中国，而应该倾向于东南亚当前的情况，并以塑造一个马来亚国为目标”。

随着中英政权的撤退以及新加坡国的诞生，华人面临国家认同的大转变，大批原来持有英国护照和中国国籍的华人，来到转换身份、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抉择。这是一个转折点，新的国家认同意识逐渐提升。新加坡建国初期，国家意识高于种族认同之上。独立前后新加坡政府淡化种族意识，尤其是华人的族群意识，是有其岛内外因素的考量。执政者为了避免背负“第三中国”的嫌疑和挑起内部的种族矛盾，遂有意压抑华人身份。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华校的衰落及由此而酝酿的文化危机，也就被漠视

了（李元瑾，2002b：67-69）。新加坡以国家意识高于种族意识的方式建立国家，但国家意识的形成需要有国家文化作为底蕴。

国家文化就是以国界为限、国民为主、国家为基础的文化（游若金，1987：55）。个人在国家体系下生活，对国家自然会有认同感（national identification）。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愿望和目的、对共同价值的信奉、及团结的必要性而油然而茁长（游若金，1987：58）。形成国家文化的核心（core）是一个体系的价值以及以这些价值为基础的思想结构（信仰、理想、意识形态等）。环绕着这个核心的是文化中的表达及表现成分（expressions 及 manifestations，如文学、语言、艺术、礼俗、衣食等）。这些表达及表现成分都被认为是核心成分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游若金，1987：59）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在国家的框格内不断发展，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体，和其他国家文化比较，显得独特。核心成分和非核心成分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有特定的形式的。核心成分之所以被视为核心，是因为它们适合作为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及推动力（游若金，1987：60）。当国家文化在演化的过程中，种族文化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加坡以华族占绝大部份，因此新加坡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极大程度上要由华族文化组成。

华族文化的承传与延续的最佳途径便是以教育维护文化身份。如笔者在绪论中提及华族文化核心思想的承传，需通过华文高等教育或中文系才能达到更佳的效果。南大中文系的课程必须在本土化之下保留传统，做到承传与革新两者并进。教育本土化

的主要考量点应是规划以本土需求的教育，发展本土化的教育特色，建立本土化教育制度，培养本土所需人才。

1969 年的第十届毕业典礼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南大开办以来，最后一届采四年学分制和首届采三年学位制的学生同时毕业，标志着旧学制完全被新学制所更易。

表九：1965 年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程与 1970 年新学制课程比较表

科目类别	年级	1965 (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程)	1970 (新学制全面实施)
必修科	一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现代中国文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un Yu & Meng Tzu)	专书选读 (一)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史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中华历代文选及习作 (一)
		Malay I / 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英文
	二	Chinese Etymology	中国文字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Shih Chi or Han Shu)	专书选读 (二)
		Chinese Poetry	中国诗歌及习作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中国声韵学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中华历代文选及习作 (二)
		Malay II / Advanced Malay II	英文
	三	Chinese Phonology	中国训诂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I (Shih-ching or Ch' u Tz' u)	专书选读 (三)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
		Tz' u Ch' u	词选及习作
	四 / 荣誉班	Chinese Bibliography	中国目录学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中国古文字学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毕业论文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lassics: Shang Shu, or Li Chi, or Ch' un Ch' iu Tso Chuan	—

选 修 科	一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学概要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政治学概论
		Sociology I	社会学（一）
		Economic Analysis I	济学原理
		Reading in Chinese Prose	马华文学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中国通史经
		—	心理学概论
	二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东南亚华人史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中国断代史（一） 明清史
		Sociology II	社会学（二）
		Any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in year I not taken.	曲选
		—	中国近代史
		—	专书选读（四）
		—	中英翻译
		—	小说及习作
		—	图书馆学导论
		—	新闻学导论
	三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中国文学批评
		History of Malaysia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史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中国断代史（二） 宋辽金元史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I	东南亚地理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东亚地理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V (Chuang Tz' u, or Hsun T' zu, or Han Fei Tzu, or any other approved author)	中国校勘学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戏剧及习作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图书馆学导论
		Geography of East Asia	新闻学导论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新闻写作
	四 / 荣 誉 班	无	中国文学专题研究 （东坡词）
		—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先秦心性思想研究）
		—	中国经学专题研究 （左传 / 礼记 / 易

			经)
--	--	--	----

直至 1970 年，中文系课程已全面改革。纵观 1970 年之课程表与 1965 年王赓武报告书建议之课程表，笔者发现中文系近七成之科目皆按照王氏之建议予以改革。但一经仔细分析，笔者发现中文系把一些主修科目与选修科目进行了调整。我们可见中文系把一年级主修科目的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二年级的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换成中华历代文选及习作（一）、（二），东南亚华人史被编入二年级的选修科目。此一转变使到在主修科目之中又再次专注于中文系传统课程，本土化的课程则列入了选修科目。

郑良树曾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们开办中文系，是要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及历史等的学问，通过这些研究，认识中国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我们建造华社以及大马社会的根基。这是我们创办中文系的目标和宗旨。为了适应本土化的需要，开设少数“本土风光”，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做到了喧兵夺主的地步，那我不赞成了……主次、轻重如果不分，那么开办中文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中文系学生满脑只有马华文学，连屈原、杜甫、李白、关汉卿都没有的话，还是中文系吗？……没有中国文学，哪来的马华文学？”（叶金辉，2006：17-18）。中文系课程设制的拿捏，在于传统与革新两方面，是要保留或去除某些课程，除了师资问题为考量外，中文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宗旨、所要培养的人才、社会责任等等都在考量范围。

南大中文系 1970 年的课程显示了他们的课程仍以中文系传统课程为主干，本土化的课程如马华文学东南亚华人史、东南亚地理、新加坡及马来亚史等课程则纳入选

修科目。这委实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兼顾了无可避免的本土化转变。中文系属人文学系，人文学系培养的学生并非理科或商科的专才，而是通才的教育。中文系毕业生的出路相当广泛，在考虑到就业的问题下，增加新闻学导论、新闻写作、图书馆学导论、心理学概论、政治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等选修课，对学生的培养也非坏事。这样的转变并没有绝对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因为这转变是考虑到国情需要、就业需求和国际视野。

中文系课程本土化的另一重要性表现在往后新马中文系设立时的课程考量。廖文辉（2011：148-161）在其博士论文提及1970年代是一个本地史学的转型期，研究显示1970年代“南洋研究”逐渐式微，同时“华人研究”风气日盛。他举例说明1980年代以后，新马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逐步崛起并承担了“华人研究”的工作。但笔者认为1960年代中期开始，南大中文系课程转型是不可忽略的其中一个“中文系逐步崛起并承担了“华人研究”的工作”的前奏。

独立之后，新马两地各个领域都须要大量的本地人才。为迎合市场需要，1970年的中文系课程也让学生选修中英翻译、新闻写作和新闻学导论这一类型的课程，以便培养传媒界的中文人才。

无论如何，文化永远是即传统又创新的。各国文化与各科学术均有其固有之传统，以为向前进展之始基。无传统即无基础，墨守传统而不求进展，则固有者亦必导致枯腐衰落。大学教育对于文化学术有两重任务：其一为对于已有传统加以流传广布，以维持历史的广续性；其一则为从已有传统出发，根据新经验与新需要，孜孜研

究，以求发展与创新。灌输与启发，守成与创业，缺其一，均不足与言完善的大学教育也（朱光潜，2001：179）。中华文化来到新马两地，必有其创新之处。一个文化传统并不因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改变而消失，相反地它可以是社会重组或重建的重要根本原因。再者，一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不但可以引发一个文化价值的重新估价、重新发掘，也可以引发新的价值的创新与发展，因为社会的发展有此需要，有此必要，也提供了此一发展的机会（成中英，1997：343）。新马两地大学中文系所培养的文化人才也必须有根据新需要而加以创新的眼光。

所谓创新与发展，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核心，即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来到新马这片土地上和其他文化的融合与适应。普遍上人们称这种情形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本土化”。这一层工作可交给文化人才，把中华文化的根基巩固在这片土地上并发扬光大。

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下，南大中文系的课程所作的改革实是丰富了其内容，这也不失为吸引学生与师资的原因。这一时期所吸纳的师资阵容相当鼎盛，学生人数也在1965年以后逐步上升，形成了南大中文系的全盛时期。

第三节 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境（1975年-1980年）

1967年起新加坡政府实行双语政策，强调与突出英语作为政府用语和商场用语的地位，规定各语文源流学校都要以英语和母语两种语文进行教学，英语已提升为全

民的共同语（周聿峨，2002：122）。从1946年至1954年，华校注册学生总人数，一直超越英校。从1959年起，华校无法再维持过去的优势，一年级注册新生人数不再超越英校，而且与英校差距越来越大。华校小学生新生人数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华校解体（李元瑾，2002b：71）。南洋大学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面对发展的艰巨挑战，整所大学的各个科系都面临发展危机，中文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无可避免的遭受波及。

南大创立宗旨之一乃培植师资，中文系更在其中担当重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华校生数量减少、华校间数下降，便不再需要大量华文师资，南大中文系培植华文师资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不吃重。据悉，由于南大文凭不获承认，中文系毕业生若要在政府学校执教，则需接受教育学院中文师资培训。新加坡于1950年代起便有师训学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颁发教育文凭（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给非大学毕业生。马来亚大学成立之时，也成立了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专门培训大学生成为全职教师。这一时期的师训学院教育并不影响南大培植师资的宗旨，其因乃由于南大招收的学生是文凭不受政府教育制度接受的学生。因此在1960年代，南大依然每年为新马两地培养不少的华文师资。然而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已经独立五年，潜在的大学生来源都是循着独立后政府的教育系统培养上来，加上南大不能再公开招考大马学生，南大的新生来源便与新大和其他学院一样。尤其是1967年新加坡双语政策实行后，直接影响南大的竞争力。笔者认为新加坡中学生若有意愿当教师者，在政府的教育系统和社会对南大生就业问题成见下，会更趋向于选择1973年由师训学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基础上成立的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南大培植师资的角色在各种时局与政策的转变中逐渐变轻，南大中文系在培植中文专业师资的角色亦然。

1973年起，南大遵照新加坡政府“配合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双语政策”和“统一招生原则”这两项政策的实行对南洋大学甚至于南大中文系发展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改变引出了潜在的衰落因素。南大处在动荡与飘摇的时期，中文系亦面对各种内忧与外患的发展困境。

政府推行的“双语政策”和“统一招生原则”政策影响了南大乃至南大中文系发展，导致学生的素质逐渐低落，成为南大中文系发展的绊脚石之一。王赓武认为南大初办时学生的质量很高，“在战前及战后初期，新马好的毕业生是朝中国去留学深造……1949年以后就不方便了……一去就不可回来……故当时较好的中学生就朝南大去……所以南大初年那一批学生有些年纪比较大，而且中学毕业了好几年，南大一开办就朝向它，故质量一般很好”（李业霖编，刘宏，2002：394）。

“双语政策”的推行使到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比建国初期低落许多，加之南大不能招考大马新生，学生来源主要集中于受双语教育的新加坡学生。这样一来，南大招收的新生的华文水平自然可想而知。王赓武受访时曾叹道“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学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李业霖编，刘宏，2002：394）。

此外，华校生在新加坡就业艰难的问题一直相当严重，这个问题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新加坡独立以后都存在。受英文教育者的就业机会比华校生多且薪水更高。

“新加坡政府指出新加坡好的中学生不愿到南大去，都往新大。结果南大学生都是新大不收的。我印象中记得新政府鼓励新大收最好的学生，无意把大学生平均分布于两所大学，这是政策上的问题，南大毕业生找工作时更被看成是次等，文凭被贬。此影响到父母的抉择，多让子女念英校、考新大……这政策大约在 1975 年以后就开始实施，经过几年之后大家也不愿意到南大去，教师虽好，奈何学生素质差”（李业霖编，刘宏，2002：395）。

父母基于子女的就业前景，年轻人也担心毕业出路，这样一来进入南大的学生自然减少了，报读中文系者更是日渐减少。中文系学生来源减少，学生因没有足够的华文素养而导致素质下降，在这种种的导因下中文系面临发展困境。最终只能以调整课程的方式配合学生程度培养学生。这一情况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水平与素质自然又更低了。

从 1974/75 学年度开始，南洋大学实施学科制，以取代学分制。全校各院系之学科分为学年科目及学期科目两种，两个学期科目相等于一个学年科目。学生必须在三年至五年内修足 18 个学年科目，考试及格方能毕业。学生除选读主修课程外，得选读一本系或外系之副修课程及若干选修科目。主修课程至少 9 个学年科目，副修课程至少 5 个学年科目（1974/75 学年度南洋大学课程及选课：1974，1）。1975 年，在教学媒介语方面，除中国语言文学系之外，全部学科改用英语教学。

1975 年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包括：现代中国文学、论语及孟子、中国文学史、中华历代文选、语言学概论、英文及体育。学生必须在现代中国文学、论语及孟子、中国文学史、中华历代文选及语言学概论之中选择两科作为主修科，另选一科作为副修科。除此之外，主修中文系之学生，亦得选读文学创作副修课程。文学创作课

程提供翻译及散文及习作，两门科目供学生选择修读其一。虽然南大学制更易，但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尚还保留原貌，一年级的课程主要打好中文系的文学、哲学、语言学基础。

中文系二年级的主修课程则有：中国文字学、中国语音史、中国诗歌、子史选读、中国文学批评、星马华文文学和中国小说。其中“子史选读”一科，将在庄子、刘子、史记或其他该系指定之子史专书中，任开一科。是年的“子史选读”指定《庄子》为专书。⁵副修课程则在主修课程中选择两科修读。二年级的文学创作副修课程开办现代小说及习作和现代戏剧及习作。

三年级的主修课程涵盖了比较文学、诗经、楚辞、中国哲学史、中国训诂学、词曲选、现代中国语言学，副修课程则在主修课程中修读两科。三年级的文学创作副修课程共开办三门课，分别是：诗歌及习作、修辞及习作和文学原理。三年级学生只需从三门课当中选择两门课修读。此外，以中文系为主修，已选读第二年“中国诗歌”者，若选文学创作作为副修，则不得再选“诗歌及习作”这门课。

凡三年内持有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便得以攻读荣誉学位。荣誉学位的课程为期一年，所开办的科目包括：中国古文字学、中国目录学、华文第二语文教学法、诗选学、宋词——东坡词、魏晋玄学、左传、现代汉学。学生必须从这八门科目之中选修四门课，并且撰写一篇毕业论文方能完成学位。

⁵中文系的课程也会受到系上师资的专业领域影响。是年的“子史选读”选了《庄子》为课程主题。其中最大的原因乃是当时系上教授——王叔岷的专业在于庄子。

由 1975 年的南大中文系课程表可见南大中文系课程的延续 1965 年王赓武报告书改制之后的本土化趋势。一年级的“翻译 Translation”课程乃为适应华校源流学生之需要，此课程重点在培养学生写作英文的能力，利用英文各种句型作为中译英的准则。务使学生对所有英文造句法都掌握到手，翻译时方可运用自如。南大中文系也给二年级学生开设“星马华文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Malaysia”一科，评述自 1920 年代到现阶段（笔者按：即 1970 年代）星马华文文学的发展，探讨著名作家和作品。

荣誉班开办“现代汉学 Modern Sinology”这一门课。其内容着重于，一、欧美及日本汉学发展史概要：汉学之定义、起源及发展简史，早期重要汉学家及其重要著作；二、目前欧美及日本之汉学研究：重要汉学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期刊、参考书；三、欧美及日本中国文学论著选读：英文及日文中国文学史选读、欧美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选读、欧美论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读；四、欧美汉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学）方法之新趋势：学术论文写作之方式、研究方法与范围。可见南大中文系已注意到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文系学生必须开拓视野。为适应全球化趋势，中文系学生也需要认识东、西方不同背景的中国研究，不能再紧守传统的中国研究，也应注意其他区域的研究成果。虽然 1965 年的《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建议把南洋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更易为“汉学系”，但中文系课程至 1975 年仍保有源自中国与台湾系统的中文系课程，并未改变成欧美体系的汉学系课程。尽管如此，南大中文系也没有固步自封，仍然把课程的触手伸向汉学系统，在荣誉班的课程之中纳入一门“现代汉学”。

此外，培植华文师资仍然是南大中文系的一大宗旨。因此可见有关语言及教学法方面的课程。三年级的“现代中国语言学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的课程内容包含语音、语法和构词、词汇和语义、方言和标准语、现代中国语言的演变、现代中国语言学和华语的学习与教学。此外，三年级学生也可学习“修辞及习作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之中的修辞概说、修辞的目的及效用、修辞的历史、方法、练习；修辞与写作的关系。荣誉班开办了五门有关专题研究的课程。其中，“中国语言学专题研究：华文第二语文教学法”教导的是实用语言学——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语言教学的原理与原则；近代语言教学法的发展；中学华文教学法通论；华文第二语文教学法论例。

尽管中文系的发展看似良好，但 1976/77 学年度更新的课程却大幅度地减少中文系学生在传统课程中所该学的基本功。笔者认为此举与师资减少并无太大关系，因为是年的师资共有 14 人。是年选修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按学年修读下列各组合之科目。第一学年必修中国文学史，选修中国新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或中华历代文选。第二学年，必修中国文字学及自论语与孟子、中国哲学史、中国诗歌、中国小说以上四科中选读二科。第三学年则细分为语言文字组及文学组。选修语言文字组者须自中国语言学、中国语法、声韵学、训诂学、修辞学，五科中选读四科目；选修文学组者须自子史选读、中国戏剧、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诗经与楚辞、词曲选，五科中选读四科目。荣誉班学生除毕业论文外，必修一科，即中国目录学与西方汉学。语言文字组者选修文字学专题研究（一）、（二）和语言学专题研究（一）、（二）。文学组者选修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一）、（二）和现代文学专题研究（一）、（二）。以上每一选修科目均为 2 小时科目，荣誉班学生必须从中任修 6 小时的科目。以上的课程为

主修课程，其副修课程未列入课程表内，因副修课程已改为以其它科系的课程为副修。1978年，系主任李孝定退休，离开南大中文系回到台湾。

1976/77年的新课程与1974/75学年度所颁布的中文系主修与副修课程表相比，当时的副修课程是中文系内的课程，而非其它科系的课程。此年课程结构有其利弊，学生在一、二年级的每一个学年只上两个本系科目，到了三年级又分为语言文字组或文学组。从此课程结构来看，学生未能广泛学习中文系所学的经史子集或文史哲，与1970年完全改制之后与1974/75年再改制的课程内容相去甚远，但其训练结果就是学生将能在其选择的领域里更精专。这样的课程结构转变极可能使到对中文系有抱负者转而投向其他高等学府如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笔者认为本科阶段的课程训练应以广泛接触各类课程为佳，让学生能在文、史、哲各方面互通。若学生想继续钻研有兴趣的领域，则到研究所阶段深入学习。

从新加坡政府政策的实施至南大校方招收学生的限制，再到中文系课程设制的转变，让人看到了中文系发展的内忧与外患。全校各科系与中文系一样面对各种发展问题，最终南大走向被关闭的命运。尽管如此，南大中文系依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他们对新马社会的贡献与建树有目共睹。

第四章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对新马华社的贡献

南洋大学于 1956 年开课，至 1980 年被并入新加坡大学为止，前后共有 21 届毕业生。南大学生毕业后，纷纷投入社会工作，中文系同学也分别涉足政、经、文、教各领域，表现可圈可点。谁也不能否认南大在艰苦环境里已为新加坡和邻近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在独立建国年代，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从 1959 年到 1980 年，南大总共栽培了一万两千五百名毕业生。对新加坡而言，四十多年来，南大生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教育各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些南大生的成就，例如学术和艺术方面的表现，更是跨越本区域的（李元瑾，2001：1）。本章旨在论述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如何透过本身涉足的领域，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并立足本土。笔者将从教育与学术、传媒与文化、文学与创作、历史与政治，共四个方面来探索中文系毕业生在新马承传中华文化及融合与推动本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节 教育与学术

一、高等教育

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于 1959 年底离校之后，不少校友即于 1960 年开始出国深造。许多南大校友考取高级学位后，或留在海外大专学府发展，或回到母校任教职。这当中，在新加坡大专学府任职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分之三，其次是马来西亚，再次顺序是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及香港各地（王慷鼎，2004：429-430）。新加坡的

高等教育，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传统上所谓的大学，但不一定以“大学”两字命名，不但吸收本科生，颁发学士学位，也招收研究生，颁发硕士、博士高等学位，就 1960 年代初至今（2013 年）来说，这类学府有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义安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开放大学、三一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等。另一类是专科性质但不发学位的学府如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等（王慷鼎，2004：430）。这些大专学府，自 1960 年代起便吸纳不少南大毕业生投入服务，他们或担任教职，或从事研究工作，或担任行政职位，不少中文系毕业生散布其中。

由于一些学府的文献资料如手册或简介中所列出的教学人员名单及学历背景，不甚完整，因此本章节的讨论范围只选择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及三一神学院，这六所新加坡高等教育的骨干与主流学府为讨论对象。冀通过六所高等教育学府教师人数探析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过去五十年对新加坡高等学府的教学与研究之贡献。

（一）任职人数

下表显示由 1962 年至 2003 年间⁶，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及三一神学院，这六所学府共聘用了 352 名南大校友担任教职或研究工作。其中以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2003 年）聘用的人数最多，共 129

⁶ 基于资料所限，笔者只能以此年间为限。

人；南洋大学（1962-1979 年）以 124 人居次；国立教育学院 44 人（1971-2003 年）、南洋理工大学 30 人（1987-2003 年）、新加坡大学 19 人（1966-1979）、三一神学院 6 人（1977-2003）。

表十：新加坡大专学府南大校友学术人员统计

学府	聘用人数	重叠人数	实际人数
南洋大学	124	-	124
新加坡大学	19	3	16
新加坡国立大学	129	84	45
国立教育学院	44	6	38
南洋理工大学	30	15	15
三一神学院	6	1	5
总数	352	109	243

资料来源：王慷鼎，2004：432。

尽管南大毕业生在前期的南洋大学和后期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受聘人数最多，但中文系毕业生的受聘人数却不是占最多的。反观国立教育学院自 1971 年开始所聘用的中文系毕业生高达 20 人（见下表），培育新一代的中小学师资人才。由此可见大量中文系毕业生投入教育工作领域，是个不争的事实。

表十一：新加坡大专学府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学术人员统计

学府	聘用人数
南洋大学	11
新加坡大学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14
国立教育学院	20
南洋理工大学	6
三一神学院	1
总数	55

资料来源：整理自（王慷鼎，2004：453-476）。

注：总人数包括重叠人数。

在 243 名投入新加坡大专学府服务的校友中，有 90 人或 37%出身文学院、121 人或 49.8%出身理学院，其余 32 人或 13.2%商学院。出身理学院的人数最多，而在全校各系中，也以理学院数学系的人数最盛，共有 40 人；文学院的中文系则紧追数学系之后，共有 39 人（王慷鼎，2004：434）。就学历来看，243 人之中，共有 147 人或 60.5%拥有博士学位；76 人或 31.3%有硕士学位；其余 20 人或 8.2%则只有学士学位。39 位中文系毕业生之中，拥有博士学位者占 20 人，硕士 11 人与 8 名学士。就数量上来说，中文系毕业生之中考获博士学位的人数遥遥领先文学院其他科系。而以学士学位在大专院校服务校友，大部分原是中学老师，因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上曾受过师资训练，拥有专业性的教育文凭，因此被招聘或借调到师资训练学院或教育学院当讲师，培育中小学师资（王慷鼎，2004：434）。中文系毕业生的 20 位博士之中，其中 12 位在新加坡考获博士学位，2 人在美国，2 人在香港，英国、法国、中国、德国各一人（王慷鼎，2004：437）。

（二）教学与行政职位

39 位在新加坡大专学府任教的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之中，有一位教授、10 位副教授、3 位高级讲师、12 位讲师，另 13 人担任其他职位。担任教授的是周清海（第 8 届）；副教授则是龚道运（第 2 届）、陈荣照、苏新鏊、梁荣源（第 3 届）、王永炳（第 4 届）、杨松年（第 5 届）、谢世涯（第 7 届）、辜美高（第 8 届）、云惟利、吴元华（第 10 届）、林万菁（第 14 届）（王慷鼎，2004：440-441）。

中文系毕业生在教学与研究之余，又因为系务、院务、甚至校务的需要，往往受校方委以种种学术行政的重任，或出掌系务院务，或担任各类研究单位如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的领导（王慷鼎，2004：447）。由于某位毕业生可能先后担任几种职位，因此曾经肩负学术行政工作的中文系毕业生共有 21 人次。翁世华曾担任南大文学院副院长，林万菁曾任国大人文暨社会科学院助理副院长。

曾任正、副系主任的中文系毕业生则有 9 人，他们分别是：陈荣照、周清海、马国治、谢淑美（正）、王慷鼎、林万菁、杨松年、云惟利、黄建邦（副）。他们在高等学府担任系主任要职且有优异表现。以陈荣照为例，他在 1990 年代初开始主持国大中文系系务至 1999 年。在他任内，该系学术人员多达 43 人，学生人数逾千，研究成果丰硕，是中文系近 50 年历史中的高峰时期。此外，在他任内成立的汉学研究中心，不但加强了本地汉学及华社历史的研究与出版力度，也大大提高了中文系的地位（王慷鼎，2004：449）。至于周清海，他在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及国立教育学院任教 30 余年，长期担任各种行政职务，曾是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主任、中文系主任，同时也是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开创主任，在培养中学华文师资及推广中华语言文化的研究与出版方面付出甚多（王慷鼎，2004：449）。

表十二：曾担任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行政职位中文系毕业生

姓名	单位
翁世华	南大亚洲研究所助理所长
陈荣照	国大汉字研究中心主任
王慷鼎	国大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松年	国大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万菁	国大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清海	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云惟利	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副主任

卢绍昌	南大华语研究中心、国大华语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	------------------------

可见，在新加坡高等学府任职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也普遍地参与学术行政工作。第一届毕业生，卢绍昌，也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任职。从学术人员人数的角度来看，中文系毕业生在 243 名投入新加坡大专学府服务的校友中占了 39 名，可说南大中文系过去所培育出来的学子在新加坡大专学府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担任正、副教授者，任职学术行政职位者，皆不乏其人。

表十三：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的中文系毕业生

姓名	届数
翁世华	1
龚道运	2
陈荣照	3
苏新鏊	3
王慷鼎	3
杨松年	5
陈海兰	5
辜美高	8
林万菁	14

南大毕业生之中，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有第一届毕业生吴天才，南大毕业后，他取得马来亚大学硕士资格，曾任副教授一职。此外王介英（第 15 届）也曾先后于马大中文系和拉曼大学中文系执教，专攻中国语言与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第 11 届荣誉学位毕业的郭四海曾出版一本《中国文学史》，此书成为马来西亚中六华文科的其中一本教科书。对于把莘莘学子引进古典文学之门，此书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培养中学师资

1960 年代以前的新马华文中学师资经常发生人源荒，必须从中国或港台聘请，但又常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自从南大培养了大批毕业生以及留台毕业生回国后，各地中学教师空缺得以填补。南大毕业生在马来西亚教育界服务的可分为两类，即政府学校和华文独立中学。在政府中小学服务的南大毕业生数目不详，相信不会超过几十人（韶义，1982：74）。在教育领域，南大校友是 60 间华文独立中学师资的最主要来源。60 年代起，南大校友在独中担任校长、教师及各级行政人员者比比皆是。如果说那个时期独立中学是依赖南大校友支撑并不为过（林金树，2004：184）。根据全国独中工委统计，1981 年在全国 60 所独中服务的南大校友共有 200 人，189 人担任教师或主任，11 人担任校长（韶义，1982：74）。⁷1959 年第一批南大毕业生离校开始，南大也为华校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迫切需要的师资。

在马来西亚境内华文独中担任校长的中文系毕业生有陈郁菲（第一届）任怡保培南中学校长、张怡生（第一届）任霹雳安顺三民独中校长、李云溪（第一届）任麻坡中化中学校长及许兴梅（第三届）任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长（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1990：282）。

⁷邓日才曾写到“单是新加坡就有上千南大生在中学任职，马来西亚独中，估计前后有两千名南大生任教职，南大生出任独中校长的，约有 40 人，超过全国 60 间独中校长总数之半”（邓日才，2004：419）。邓之文章虽说大马独中估计约有两千名南大生任职，且有约 40 人出任独中校长。由于目前笔者所见的资料并未有如此庞大之人数，例《南洋大学史料汇编》（1990）仅显示 18 人曾任独中校长，因此对邓之说法仍有所保留。但是，南大毕业生担任独中教职也必有相当的数量与不可漠视的贡献。

陈郁菲校长掌舵 35 年怡保培南独中。陈郁菲 1955 年怡保育才中学毕业后，隔年即考进南洋大学中文系，1959 年毕业。1960 年被聘为怡保培南中学华文教师。1962 年培南接受政府津贴改制为国民型中学。1963 年培南独立中学成立，与培南国中分家。陈郁菲在艰难时刻，临危受命接掌独中校政，时年仅 26 岁。自此引导独中由艰苦走向康庄大道，成就今日之培南独中（王慷鼎，2010：102）。

第一届中文系毕业生除了陈郁菲以外，其他同学也在杏坛上表现出色。李云溪则在麻坡中化中学这所独中担任校长；谢添顺曾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校长多年；陈静姿出掌新加坡四德中学多年，这是一间政府开办的中学，对中、英文特别重视；王秀莲曾任佛教总会开办的文殊中学校长；邓佩如曾当过几年的圣公会中学校长；叶昆灿则以非教徒的身份当了近十年的公教中小学校长；曾渊澄当过中正中学华文科主任（唐尼，2009：166）。

在文坛颇有成果的谭幼今（第 14 届）和周维介（第 14 届）也是投身教育界的一分子。谭幼今毕业后曾任记者，过后到中学及初级学院为华文教师。周维介 1974 年获荣誉文学士学位后，便到教育界服务，并曾于 1983 年至 1992 年担任教育部华文科视学官（区如柏，2004：166-167）。

叶钟玲 1956 年考获剑桥九号文凭，高中毕业后负笈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1 年考获文学士学位。历任芙蓉中华中学、新加坡南侨女中、淡马锡初级学院及南华中学华文教师前后四十年。期间亦曾在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区域语言中心兼课，

及在教育部道德教育组及课本审查组任职。任教期间，曾在 1970 年代编著高级中学“理解与写作”科教材数种，为新加坡各校普遍采用（王慷鼎，2002：80）。

陈闻察与叶钟玲乃同届中文系毕业生。1961 年毕业后，翌年便被新加坡教育部聘为德能政府华文中学华文科主任，共任职 16 年。后来也曾担任华文期刊总编辑、大学兼任讲师（王慷鼎，2002：81）。

李宝强是第 2 届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1967 年考获新加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的一生在新加坡教育界服务，长期担任中学（立化及华义）及初级学院（圣安德烈及裕廊初院）教师、华文科主任、训育主任及校长秘书，亦曾出任大专学府教职及新加坡教育部专科视学官等职位。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李宝强也以笔名李建写作。他至今出版了小说集 15 部、散文杂文集 18 部、文艺评论集其他论著 15 部、新诗集 2 部、儿童文学 9 部、中学及初级学院学生补助读物十余部等（王慷鼎，2010：110）。

南洋大学中文系在培养中学师资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表显示有就业资料的 295 名毕业生之中，共有 176 人在教育界服务，占了 60%，其中 118 人在中学任职。填写任职单位为教育部者有 23 人。笔者认为这 23 人应该大部分都在中学服务。在小学服务者则到了 1975 年和 1976 年才分别有 2 人及 1 人。这是因为早期在新马地区，大学毕业资格的教师一般都被派往中学任教。

表十四：在教育界服务的中文系毕业生

届数	年份	小学	中学	高等学府	教育部	其他	总数
1	1959	0	7	3	0	4	14
2	1960	0	2	2	1	2	7
3	1961	0	1	5	1	1	8

4	1962	0	2	3	0	7	12
5	1963	0	3	2	1	2	8
6	1964	0	2	1	1	2	6
7	1965	0	0	0	0	0	0
8	1966	0	3	1	2	1	7
9	1967	0	0	2	0	0	2
10	1968	0	3	0	1	1	5
11	1969	0	9	3	0	7	19
12	1970	0	3	2	1	10	16
13	1971	0	12	1	1	16	30
14	1972	0	5	0	1	16	22
15	1973	0	8	4	4	12	28
16	1974	0	15	3	4	5	27
17	1975	2	16	0	2	17	37
18	1976	1	13	0	2	6	22
19	1977	0	12	0	1	8	21
20	1978	0	2	0	0	2	4
总数		3	118	32	23	119	295

资料来源：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注一：此表乃从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提供的资料中撷取南大中文系毕业生的职业资料整理而成。虽然南大中文系毕业生近千人，但提供资料者仅 295 人，故笔者以所收集到的资料人数为基准。

注二：于高等教育学府的图书馆或行政单位服务者归类于高等学府。

注三：职业栏填教师，但任职单位填教育部者，由于无法确知是小学或中学师资，笔者将之归类为教育部教师。

注四：自雇人士、政府部门、文化界、私人界等领域服务者，归类其他。

三、学术研究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投身报界的同时也兼顾文艺创作或学术研究。由于投身报界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好创作、文笔好的同学，因此从事文艺创作自然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者也因继续深造而开始执笔撰写学位论文，从事学术研究之工作。

第三届毕业生王慷鼎虽然只在报馆工作十余年，而他毕生却与报业结下不解之缘。他毕业后投考《星洲日报》为招聘新闻翻译员而举行的甄拔考试被录取了，他很希望从事翻译工作，可是报馆的记者人手不足，他无奈地去任记者采访新闻，五年后改任新闻编辑。五年的采访生涯，使他对广义的新闻事业产生兴趣，还获得美国亚洲基金奖学金到美国伊利诺州的南伊利诺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念新闻学。1969 年底考获新闻学硕士后，回到《星洲》受委为报馆的公关主任。1971 年王慷鼎到外交部任职，1976 年到南大文学院大众传播组任新闻学讲师。南大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后，他在国大中文系执教，曾任国大中文系副主任。他以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为研究专题，撰写论文考获博士学位（区如柏，2004：152）。王慷鼎的著作都以报章为研究对象，计有《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檳城新报〉政论篇目索引（上篇：1895-1911）》、《〈檳城新报〉政论篇目索引（中篇甲：1912-1919）》、《〈檳城新报〉政论篇目索引（中篇乙：1920-1927）》、与姚梦桐合著《郁达夫研究论集》、与杨松年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等（区如柏，2004：152）。王慷鼎于 1998 年退休后，仍旧致力于写作，他收集了母校钟灵中学 400 名校友的资料，撰写了《钟灵中学四百校友人生之旅》（区如柏，2004：153）。

第 11 届荣誉班毕业生吴元华是《早报》副总编辑，1973 年获南大文学硕士学位。吴元华于 1998 年考获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之后他到南大兼任高级讲师，不久升为兼任副教授。他的著作和译作丰富，著作有《母语——打开文化报库的钥匙》、《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65》（博士论文）、《平心而论》（政论、新闻特写、杂文选集）以及《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等（区如柏，2004：158）。

苏新鍪是南大中文系第 3 届毕业生，他的研究专长是中国哲学。他到香港大学中文系修读硕士之时，曾得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赐教。1967 年学成返新后，在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长达 35 年，所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魏晋玄学、近现代思想、现代儒学专题、先秦诸子哲学专题等。教学之余，更将心得与成果写成论文、专书发表，如《郭象庄学评议》、《先秦儒学论集》，推动新儒学的发展（王慷鼎，2010：92）。因为苏新鍪对儒学的深厚了解，新加坡政府上世纪 80 年代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思想教育，以及为了在学理上推动儒家思想的探索与研究而成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这两大社会工程时，即受邀积极参与其事。前者如对中学儒家伦理思想教材的设计、编审及师资的培训，后者如对研究所设立的初步建议与策划，都作出了贡献（王慷鼎，2010：93）。

第 2 届毕业生龚道运在南大中文系肄业后，曾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师从牟宗三，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学成回新，受聘回母校南洋大学中文系当讲师。两年后转到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博士论文则师从饶宗颐，研究儒学。1997 年从新大中文系正式退休（王慷鼎，2010：94-95）。苏新鍪和龚道运两位学者都可说是中文研究的第一代本土学人，他们扮演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除了王慷鼎、苏新鍪、龚道运之外，从事学术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尚有前文已介绍在高等教育机构任职的学者，如陈荣照等人。还有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而研究新加坡入学和民间信仰的林纬毅（第 11 届，荣誉学位第 12 届）和研究新加坡、马六甲

碑文与墓碑的庄钦永（第 12 届）等学者。可见南大中文系培养的人才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贡献良多，也为本土文化的推动献力。

第二节 传媒与文化

在 20 年代与 30 年代间，一批批中国知识分子，或受到政治迫害，南来避难；或因战乱频仍，南来谋生。他们大多厕身教育界，充当教书匠；有些投身报界，从事新闻工作。他们当中，有的具有良好的学历，有的具有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他们写得一手好文章，并勤于笔耕，作品经常刊诸报端或杂志上，拥有广大读者，大大推动了新马的文学与新闻事业的发展（崔贵强，1993：36）。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南来，不但影响了华文中学师资来源，也影响了华文报章人才的来源。

自 1965 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在教育领域方面便以双语教育为基础。1980 年代以后的新加坡，除了社会语言的环境有朝向单纯化发展的趋向之外，在教育领域方面过去多种语文源流学校并立的局面亦有了急速的转变（梁秉赋，2006：109）。意即以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逐渐式微，反而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国民型学校为主流。这一转变导致新加坡年轻一群的华文程度越来越低落。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若是连基本的语言技能也无法掌握，更遑论文化的承传。然而，新加坡中文报业却在这期间持续出版，当中虽经历不少转折与事件，但其以华文传达资讯、维护文字与文化的角色却依然不变。华文报章的读者群以中年以上为主，缺乏年轻人市

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报业已渐渐把报道的呈现方式趋向年轻化，争取吸引年轻读者。

50年代后，由于中国方面不能再输出专门人才，新加坡新闻从业员的中国背景渐渐趋向本土化。基于此，当时的报馆急需从本地招聘更多的人才，而这些“本土人才”便从本地汲取而来。1950年代南洋大学的创立正好接轨这个缺口，符合其“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的宣言。1959年底，南大第一届毕业生考试完毕，即成了各华文中学及华文报章罗致人才的对象。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梁丁尧、陈其溥、饶柏华分别进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区如柏，2004：148）。第二届及较后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如王慷鼎（1936-2011年）和李文学也加入报社工作。历史系毕业的张清江说，60年代报社的编采人员不多，南大校友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区如柏，2004：149）。虽然如此，中文系毕业生在其中却没占有较高比例。踏入报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南大毕业生中，尚有其他科系的学生，如历史系、地理系、经济系、生物系、现语系、生物系和政治系。笔者认为，中文系毕业生投身报界的比例并没有比其他科系来得多的其中一个原因乃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极大部分都已进入教育界，在华文中、小学服务。譬如赵永廷毕业后，到《新明日报》任编辑与翻译，大约一、两年后转到教育界服务（区如柏，2004：156）。

南大校友加入马来西亚华文日报服务的，主要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而且绝大部分是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工作（林金树，2004：185）。1960年代新加坡华文报章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在新马分家前，《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总社都在新加坡。分家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分别在吉隆坡

成立总社，新马两地的报章从此各自行政独立，互不隶属。《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吉隆坡出版，一切从头开始，必须招募各部门员工，编辑部更需要大批人手。因此，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进入这两家华文报工作的南大校友人数最多。其中又以当编辑的南大校友尤其多，例如《星洲日报》刚刚在八打灵出版时，编辑组同事几乎清一色是南大校友（林金树，2004：186）。在报社服务的南大校友，来自文学院的以中文系、历史系和现语系者为最多。来自中文系的，主要是担任编辑工作，因为他们的中文根底比较深厚（林金树，2004：187）。在东马报章工作的南大校友，仅有中文系的李福安长期在古晋的《国际时报》服务，并担任总编辑兼董事的高职（林金树，2004：187）。

在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服务的中文系毕业生有：黄宗理、颜翹步、陈友平、吴丽青、江惜如、王锦发、颜永才、陈基球、赖鸿健、陈清德、林明水、林腾飞、罗毅珉、陈金田、陈良甚、李福安、冯玉姬、梁长春（林金树，2004：193）。在《星洲日报》服务三十多年的颜翹步曾荣获《拿督黄纪达新闻奖》之下的《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林金树，2004：190）。

林通光（第一届）是《星洲日报》采访部的重量级人物。他于 1959 年首届中文系毕业后，曾回到母校吉隆坡尊孔中学执教，1963 年加入苏丹街《星洲日报》采访部。他的中文造诣甚深，对同辈互相尊重，对后辈则循循善诱，做事光明磊落，为人耿直。马来西亚许多有名的记者如：刘鉴铨、黄超明、萧依钊、许春、卜亚烈、黄家楨和梁景兰等人，初出道时都深受他指点引导，有者甚至是他亲自面试录用的。大马报人古玉樑对林通光有这一评价“可以肯定，林通光是半世纪以来，马来西亚新闻专

业水平，道德操守最强的华文报记者，举他为‘记者典范’亦不为过”（古玉樑，2011：65）。

新加坡的《星洲》和《南洋》本是竞争对手，1982年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宣布新加坡华、英文报章大改组，《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一家控股公司（区如柏，2004：176）。1983年3月两报正式合并，分别出版《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

第一届（1959年）至第四届（1962年）毕业的南大校友，投入报馆工作“从一而终”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包括中文系的饶柏华、陈其溥和李文学都是坚持到退休年龄才离开报馆（区如柏，2004：150）。第五届（1963年）至第十届（1968年）的中文系毕业生投入报界服务的也不少，其中包括：第五届的区如柏、彭霖贵，第七届的赵永廷、李开与第十届的郭坤福。加入传媒领域的中文系第十一届（1969年）至第廿一届（1979年）毕业生相比前人为数更多，成就更为耀眼。尽管投身报业的中文系毕业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他们的质量与贡献却不容忽视。

表十五：南大中文系校友在新加坡传媒领域简表

序	姓名	届别	单位	岗位	服务	其他
1	梁丁尧	1	星洲	国际组主任	约20年	从商
2	饶柏华	1	南洋、早报	言论组主任	30年以上	退休
3	陈其溥	1	星洲、早报	编辑	30年以上	退休
4	王慷鼎	3	星洲	公关主任	十余年	
5	李文学	3	星洲、早报	副总编辑	30年以上	退休
6	区如柏	5	星洲、早报	记者	28年	退休
7	彭霖贵	5	南洋	记者		
8	李开	7	星洲、早报	编辑	34年	
9	赵永廷	7	新明	编辑		退休
10	郭坤福	10	星洲、早报	副编辑主任	25年	
11	吴元华	11 荣誉	海峡、早报	副总编辑	23年	

12	尹修良	11	星洲、早报	编辑	26年	
13	邹瑞群	11	星洲、电视台	资料收集	20年以上	
14	欧清池	12 荣誉	南洋、早报	记者	22年	退休
15	周维介	14	早报、新明	副刊主任	4年半	创业
16	谭幼今	14 荣誉	南洋	记者		教师
17	王炳发	15	新明	副总编辑	29年	
18	翁鸿珍	15	星洲、早报	翻译		
19	沈玉兰	15	新明	编辑	约20年	
20	吴启基	16	南洋、早报	记者	28年	
21	吴德春	16	民报、早报	记者	28年	
22	许乃明	16	南洋、晚报	副总编辑	28年	
23	区富礼	17	星洲、晚报	马中港台主任	22年	
24	杜南发	18 荣誉	南洋、新明	总编辑	26年	
25	严孟达	18	星洲、早报	高级执行编辑	26年	

资料来源：节录自区如柏：〈南大校友在新加坡传媒领域简表〉，见〈南大校友在新加坡传媒的表现〉，页178-182。

注一：此简表资料收集于2004年，因此毕业生的服务单位、岗位与服务年资资料截于2004年。

注二：一些校友曾在多个传媒单位任职，图表文字只写两家，岗位只写现任（2004年）或退休前职位。

中文系所学的不仅是华语文，而是以华文承载的中华文化。报馆工作的薪资或许并非如此丰厚，但这些在报馆“从一而终”的中文系毕业生却能任劳任怨在报馆服务数十年，笔者认为他们对文化的热诚是原因之一。

1975年起，南大彻底改革，除了华语科目外，教学全面英化。在南大与新大合并之前，这项英化政策共培育了四届毕业生，即第18、19、20和21届。第18届毕业生就是这项改革之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从上表可以观察到自第18届的杜南发和严孟达后，便没有中文系出身的新闻从业员的资料。这并非说明中文系毕业生从此不投身报业，但却能清楚地告示投身报业的毕业生之中尚未有佼佼者。这或许可以说明这项改革间接抹掉了南洋大学毕业生对华文报业与华人文化的热诚。

从区如柏女士所整理的资料中显示，第 18 届（1977 年）至第 21 届（1980 年）共有 25 位毕业生投身传媒领域，当中曾在电视台工作的占了 11 位（区如柏，2004：181-182）。这个数量在历届毕业生之中算是庞大的，也说明报界的人才逐渐凋零。无可否认，马新两国中文教育的差异，影响了两国中文报业的发展。新加坡社会高度英化，自然限制了华文报业的成长，不但只发行量停滞不前（甚至下跌），而且华文报业从业员也面临断层之虞（庄迪澎，2006：35）。1980 年代以后，新加坡华社失去华文教育体系中最高的一环，无法继续培养华文人才。第一届（1959 年）进入报界的毕业生到了 90 年代以后，就已服务了近 30 年，意即到了退休年龄。由此推算，到了 2010 年代，这一批“本土华文人才”将快完全退下来，由 1980 年代教育英化以后培养的人才取而代之。有读者在早报论坛里提出“《早报》的水平有待提高”，帖文中提到“很多次发现早报的翻译词不达意，生硬不连贯，这样不但会造成读者误解，就连记者本人也会曲解或误解原意”（早报论坛网，2012）。新加坡报业人才凋零的境况由此可见一般。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华族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也渐渐浮出台面。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系统原本为华文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读者，这广大的、生生不息的读者群本来是华文报前途的最佳保障。但 1987 年开始，新加坡的学校不再大量栽培真正以华文为第一语文的学生。当然，1987 年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华校的没落，其实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在 70 年代加速，到 80 年代进入全速期——它象征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日益低落，这对华族文化的传承和华文报的前途都是非常不利的。虽然中国因素的出现使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稍有改变，转机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人们对华文的兴趣有渐渐回升的迹象，但总的来说，目前的情势还是相当严峻（李尚平，2012）。毕竟，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而且

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华人都是华文教育孕育成长的，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华文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积极作用（吴元华，2012）。“母语”其实不只是日常会话，而是包括掌握这种语文的深入层面，比如历史、文化与传统思想（庄康永，2006：70）。南大中文系孕育的毕业生在投入报界之后，对维护文字与文化贡献不小。

一、新闻报道与编辑

报馆之编辑乃决定报章内容的中心人物，编辑责任可谓重大。在新加坡政府推广英语政策之时，新加坡华文报业就如一股清流注入民族血脉之中。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新加坡报业中出任编辑者为数不少，因此他们所编的报章内容在影响着接触华文报章者。

第一届中文系生饶柏华，毕业后即投入《南洋商报》，从事采访工作，较后担任副总编辑，执行编辑等职务，并曾代表执政党当选为国会议员（一届四年），《星洲》与《南洋》合并后，出任《联合早报》执行编辑，为言论组主任直到退休。第一届的陈其溥和第四届的李文学毕业后就到《星洲》任编辑到退休（区如柏，2004：151-152）。郭坤福进入《星洲》后就任编辑，报业合并前，他曾到《南洋》一段时期，报业合并后他又和旧《星洲》的老同事一起工作了。后来他担任《早报》的副编辑主任（区如柏，2004：154）。

除了负责编辑的报业同仁外，在最前线采访新闻的记者也不容忽视。中文系毕业生中由于投身报界多年，即使在入行时担任记者，但大部分后来都获擢升为编辑人

员。尽管如此，毕业同学之中依然有少数担任记者多年的。王炳发是第 15 届中文系毕业生，他是《新明》副总编辑，可说是“从一而终”的新闻工作者。他毕业后就到《新明》任记者，采访意外及社会新闻，后来采访政治新闻。1982 年任副采访主任，1990 年任采访主任，过后任执行编辑，2002 年出任副总编辑（区如柏，2004：161）。他担任记者的经历相比其他同学来的更久。约于 1974 年他就参与采访工作一直到 90 年代。

除了报道新加坡当地社会和政治新闻之外，中文系毕业生中也有报道其他如国外新闻或体育新闻者。第 16 届的许乃明是《联合晚报》副总编辑。他毕业后就到《南洋》任编辑。在 1981 至 1983 年间，由于他懂得日语，便被委派采访与日本有关的新闻。报业合并后，他到《晚报》任高级记者，1988 年升为副采访主任，接着任新闻主任，2002 年升为副总编辑（区如柏，2004：170）。彭霖贵于 1967 年在《南洋》任记者，采访体育新闻。

二、中英翻译提升华文水平

统计数字似乎说明华文识字率随着双语教学而增加，比如《200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年满 15 岁的新加坡居民的识字率，从 1990 年的 89%增加到 2000 年的 93%，其中通晓英文和华文的华人从 1990 年的 38%增加到 2000 年的 48%，而只谙华文者的比率则从 41%降为 32%。《人口普查》对“识字率”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有阅读并理解某种语文报纸的能力”，其实，符合这个定义的大多数年轻华人觉得阅读华文报纸有困难，更不用说写作通顺的华文了。所以，调查里很多自称懂得华文的华人，可

能只是表示曾在学校读过华文这一科，他们未必真正掌握足够的华文书写与阅读能力（吴元华，2012）。新加坡电视和电台的华语节目收视率远比英语节目高，但是在阅读方面，年轻人还是喜欢读英文报纸。这是因为他们的华文水平不够，而阅读英文比较方便，吸收也比较快（吴元华，2012）。这一切都显示了新加坡年轻一代的英文水平其实远在华文水平之上。因此新加坡华人的华文水平仍有待提升，当务之急便是增加让人们有兴趣接触华文的管道。

副刊不仅提供新加坡居民一个接触华文的管道，而且也为提升华文水平作出贡献。李开于 1969 年底进入《星洲》，踏入报馆后一直担任副刊编辑。1982 年，李开被委派到学生报。在《星洲》与《南洋》合并的前一年，两报各派四人组成《新一代》编采部，每天出版四页的学生报《新一代》，随《星洲》、《南洋》和英文报《新加坡箴言报》（The Singapore Monitor）免费附送，辅助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中学生搞好华文。1984 年 3 月，《新一代》扩大为《新一代·联合学生》，李开仍旧为提高中学生的华文水平而工作。1985 年 9 月，李开回到《早报》编副刊。他对 34 年来一直编副刊并不感到乏味，反而觉得是一份很有意义、多姿多彩的工作（区如柏，2004：156）。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把 language 分为两组系统，一组是社会共用的、包含文化与思想的系统，成为语言（langue），另一组是个人平时说的话，称为言语（parole）（庄康永，2006：83）。吴元华对跨语文文化特别感兴趣，他在《海峡》任职期间尝试帮助英文源流的读者了解华人的文化。吴元华 1979 年进入时报出版集团任文教发展经理，1980 年 7 月从时报出版集团调任《海峡时报》总

编辑特别助理，兼任该报多语文版主编。吴元华是第一位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聘请为经理级人员的南大校友。1984年1月，他调任海峡时报的子公司《新明日报》⁸当高级编辑。1988年，吴元华出任《新明》总编辑。1990年调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此外，刊登于印刷媒体或电子媒体的广告，也能见到南大中文系毕业生的身影。梁丁尧 1960 年加入《星洲日报》，1979 年离开报馆，那时候他是《星洲》的国际新闻组主任。离开报馆后，他从事广告社业务，对撰写广告用语及广告的中英互译方面很有心得（区如柏，2004：158）。这一类跨语文应用可帮助华、英源流读者之间有更深层的认识。

1953 年，以陈六使为主席的南大筹备委员会，发表了〈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阐明创立南大的四大理由和二大特质。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正发挥了创校宣言的两大特质，即“沟通东西文化、发展马来亚文化”。投身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报人的职业生涯中不断从事新闻报道与编辑，传达各种资讯给广大华社。南大中文系毕业生通过华文报章，提供新加坡人一个接触华文的管道，进而提升人们的华文水平。从事报章或广告中英翻译的毕业生则帮助英文源流的读者了解华人的文化。

南大校友虽在不同的华文报章服务，但对于维持和提升本地华文报章的内容素质和华文水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些在行政部或编采部门担任高职的校友，对有关报章的业务和编辑方针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担任专题作者和主笔的南大校友，在分析

⁸ 《新明》原是驱风油大王梁润之与著名武侠小说家兼时评家查良镛（金庸）于 1967 年创办的报章，1982 年《海峡》购买了《新明》45% 的股份，1987 年 8 月《海峡》购买《新明》的全部股份，于是《新明》成为海峡时报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区如柏，2004：158）。

和评论国内外重大事件和课题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领导舆论的功能（林金树，2004：189）。诸位毕业生不但通过新闻报道传达资讯，也透过报章的副刊版位建立文学园地，推广文学创作。副刊内容可容纳无限的创意与资讯，他们所编辑的副刊内容包括华人文化与历史。历史是需要记录的，报人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另一贡献便是写下新加坡华社历史与人物的文字记录。一小部分从事学术研究者也间接地传承与发展华人文化。南大中文系毕业生通过投身报业进而贡献社会，尤其在维护与传承文化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第三节 文学与创作

南大诞生两年后，《大学论坛》于1957年12月14日创刊，另一文学刊物《大学青年》则于1959年9月29日面市。这两份刊物不约而同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华巫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并带动文艺思潮，带头探讨文化建设的种种课题。此二份刊物几乎同时于1962年底停刊，到了60年代末才先后出现《新生》、《旱雷》、《艺文》、《红树林》、《北斗》与《北斗文艺》等文学刊物。这些刊物不仅寿命短期刊少，且在影响力方面也无法与《大学论坛》和《大学青年》相提并论。南大刊物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在60年代贡献最大，60年代末至80年代南大关闭为止，南大刊物对文学成长所起的作用甚少，但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却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理论建设等等方面有杰出的表现（欧清池，2004：269-270）。

一、文学创作

许万忠的〈笔底生澜——南大写作人简介〉，是以马仑编著的《马新华文作者风采》为蓝本，参照《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收集的《南大校友著作录》以及剪报，依文、商、理各院系分类，把所能收集到的南大写作人简略介绍，总人数 219 人。文学院居冠，计 156 人，以系别分，中文系独占鳌头，共 88 人，占总人数的 41%，足见中文系在培养写作人才方面，成就卓著（许万忠，2004：294）。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周粲（原名周国粲，第 2 届），在新华诗坛上创作数量最为众多，他和擅长写叙事诗的李贩鱼（原名李大倍，第 5 届）与长河（原名陈川波，第 5 届）在五、六十年代即饮誉诗坛。70 年代初期许多诗人透过诗歌唱出心中的理想之歌，也揭露了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他们包括了毕业自南大中文系的高阳（原名李庆年，第 14 届）、连奇（原名郭坤福，第 11 届）、石君（原名吴秀珍，第 4 届）和风沙雁（原名欧清池，第 13 届）。同时期毕业自南大中文系的诗人尚有适民（原名黄盛发，第 19 届）、杜诚（原名杜珠成，第 4 届）、云惟利（第 12 届）、林万菁（第 15 届）和流川（原名陈生贵）。进入 80 年代，随着南大的关闭与新加坡华校的消失，整个华社在文化上陷入空前的虚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关心民族文化的诗人，纷纷提笔抒发胸中的郁闷，其中包括梁钺（原名梁春芳，第 15 届）和朱德春（第 17 届）。80 年代以来的新华文坛，大部分的诗人都会写出抒发心中对民族文化式微的哀伤的作品，一部分诗人从文化省思的角度阐述他们的不满。他们是南木

（原名杜南发，第 18 届）、潘正镭（第 21 届）和吴垠（原名吴启基，第 16 届）（欧清池，2004：270-280）。

新马散文自从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结束后，在题材方面彻底地本地化了。从 1965 年至 1980 年代初期，大量的散文作品描绘出新加坡的社会变迁的面貌，唱出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的欢欣与期待。80 年代初期之前的散文，无论何种题材或风格都紧扣着现实，反映社会阴暗面或有思于改进社会现状，洋溢着热爱乡土之情。毕业于南大中文系的连奇、风沙雁、石君、周粲、易梵（原名赵令茂，第 18 届）、周望桦（原名周维介，第 15 届）都是这类散文的个中高手。80 年代后，随着南大与华校的消失，受华文教育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心灵重创，写散文是为抒发胸中的隐痛。其中如张曦娜、白荷（原名梁孟娴，第 3 届）与风沙雁透过笔尖思念与惋惜南大的消失。此外也有如孟毅（原名黄孟文，第 3 届）感叹华文水平日降，华文书报少人阅读的作品。另有 70 年代写游记的代表要数骆明（原名叶昆灿，第一届）、尤今（原名谭幼今，第 15 届）和陈华淑（第 3 届）莫属（欧清池，2004：281-285）。周粲、孟毅、尤琴（原名许惠娜，第 17 届）、韦西（原名黄燊辉）、尤今、廖青（原名廖为祥，第 6 届）也擅长于写小说，他们的作品有反映教育问题的、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也有以民族文化与语文受尽冷遇为题材的。由于执笔的南大校友多在文教界工作，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也是以文教界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面为主（欧清池，2004：286-288）。

二、报人与副刊创作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文学创作就是报章的副刊内容。第 16 届毕业的吴启基是《早报》的资深副刊记者。1975 年毕业后就到《南洋》任记者，采访普通新闻、意外新闻、地方法庭和高等法院新闻等。报业合并后，他被分配到《早报》任副刊记者。每年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字公布第二天，他就能够发表一篇对得主很详尽的报道，与得主名字公布的新闻同一天见报，令同事和读者非常惊讶。甚至台湾《联合报》也转载他撰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介绍文章。他能够及时撰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介绍完全是靠早年用功。他把每个国家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英文译本）逐一阅读，装在脑袋里。当某作家得奖时，他就启动记忆，进行介绍。名字公布后，他立刻回家打稿，直到凌晨把稿传回报馆，因此能够与名字公布的同一天刊登出来。吴启基也是一位诗人，他不但自己创作，也翻译外国诗歌。他翻译的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英雄曼德拉的一首诗歌，被收入在中国学生课本里（区如柏，2004：163）。副刊的内容多样化，相较于资讯形态的新闻，倾向知识性的副刊内容更让人充实内涵。

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严孟达和杜南发都曾表示自己喜欢写作。喜欢写作相信是中文系毕业生投入报界的推动力之一。第 18 届荣誉班毕业的杜南发，是《新明日报》总编辑。他于 1977 年 3 月毕业考试结束后，4 月 1 日就到《南洋》上班，任国际翻译。不久，《南洋》创办《快报》，他兼任《快报》助理总编辑。报业合并后，杜南发任《晚报》执行编辑，主持《大特写》的策划工作与编务。后来，他改任《早报》执行编辑，不久升为副总编辑，之后又调任《晚报》副总编辑，1990 年起出任《新明》总编辑。杜南发喜欢文字工作，也喜欢写诗。21 年前（笔者按：资料来源乃 2004 年出

版，因此实际年份应是 1983 年。），他写了《传灯》这首词，由他的同学张泛（也是南大校友）谱曲。这首《传灯》被民间团体唱到马来西亚，这么多年来历久不衰，成为华族文化盛会的主题曲。杜南发的著作有诗歌集《酒涡神话》与《心情如水》，专访集《风过群山》，美术论文集《美的足迹》等（区如柏，2004：160）。杜南发通过写作与创作，把《传灯》这首词深深地烙印在新马民间，源远流长。

严孟达也喜欢写作，他说在报界工作最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是选对了职业。虽然严孟达写过很多政论文章，却没有好好地整理出版，只有早年出版过《鸟语花香》。严孟达乃是第 18 届中文系毕业生，任《早报》高级执行编辑。他 1977 年毕业考试成绩尚未揭晓就参加《星洲》的招聘考试，录取后任记者，采访社会新闻，后采访政治新闻。1983 年报业合并后，他被升为社论委员，在《早报》撰写社论。1994 年出任政治新闻组主任，1997 年出任执行编辑兼政治新闻组主任，2003 年升为高级执行编辑，仍旧兼政治新闻组主任（区如柏，2004：159）。报章的社论或政论或多或少会左右广大读者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第 12 届荣誉班的欧清池于 2003 年退休，曾任《早报》的资深新闻编辑。1971 年他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任移民厅副助理厅长。1975 年转到外交部，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在日本期间他也在上智大学深造，考获比较文化硕士学位。1981 年，他返回新加坡到《南洋》任职，撰写评论与特稿。报业合并后，任《早报》社论委员，1991 年转任《早报》新闻编辑。欧清池在工作期间继续努力学习，他于 1990 年考获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8 年考获国立大学博士学位。退休后的他是新加坡开放大学讲师，他也常在海南会馆及民间团体主讲文化课程（区如柏，2004：168）。除了

撰写评论及学术研究之外，欧清池也从事文艺创作，已出版的著作有《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政论选集；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文艺作品集《砂砾集》、《矛盾集》、《哀思集》、《樱花飘落时》、《文艺絮语集》、《风沙雁文集》以及《追逐阳光的人》（区如柏，2004：168）。

出身自南大中文系的写作人在新马两地为数甚多，他们在文坛创作不少作品，透过作品或抒发、或关怀、或思考华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社会、教育乃至文化等课题，为推动与承传中华文化贡献力量。

第四节 历史与政治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历史与政治领域的参与并不多，但其贡献却也不可漠视。由于南大有历史系培养专业的历史人才，因此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对于历史的涉猎自然就有限。

一、历史记载

杜南发和区如柏都曾经参与有关华社历史的写作，他们两位都曾服务于《晚报》的《大特写》，报道的内容涵盖新加坡华社的当地历史和人物。1983年，杜南发担任《晚报》执行编辑，主持《大特写》的策划工作与编务，发掘了许多与新加坡当地有关的史实，并将其佳作收录在联合晚报丛书《战争·乡土·创业》。区如柏毕业后到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任职，1974年2月转到《星洲》任资料室主任。后来开始为《晚报》的《大特写》撰稿，并为《早报》企业人物专题报道。1987年4月改任采访记者，采访华社新闻，同时为《早报副刊·根版》撰稿，于2002年中退休。从1985年起她便参加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及同乡会馆服务。著作有游记《两个大同世界》、《祖先的行业》、《百年树人》、《沦陷岁月》及《烽火岁月》。作品也被收入联合晚报丛书《战争·乡土·创业》，联合早报丛书《创业传奇》等（区如柏，2004：155）。由此，不可胥视他们对新加坡华社历史与人物文字记录的贡献。

庄钦永于南大中文系毕业后，负笈澳洲国立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他曾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任职多年。而后进入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新马华人历史。其著作包括《新加坡华人史史料考释》、《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等。

二、政治、社团领导

相对于南大同学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南大校友虽然没有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参与上缺席，但其参与程度不及其他领域的热烈。由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政权未曾交替，因此南大毕业生参与的政治版图可略分为政权之内与政权之外。所谓政权之内就是国阵领导的政府，其政党包括马华公会、民政党和人联党等；而政权之外的就是民主行动党等。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华人社团如董教总、中华大会堂等。

活跃于政权之内的中文系毕业生有：沈庆辉，砂拉越人联党总秘书，砂州社会发展及城市化助理部长，自 1991 年起就连续三届中选砂州本定区州议员。1960 年代加入人联党，曾一度被捕（潘永强，2004：354）。此外，1962 年毕业的庄迪福也曾是马华党员，60 年代末曾当选过州议员。1969 年初，雪兰莪的沙登州议席补选中，他代表联盟参选，击退代表行动党初试啼声的林吉祥（潘永强，2004：354）。

而在政权之外如行动党活跃的毕业生，以廖金华（1962-64）最受人注目，成绩较显著之人。廖金华早年以“杰伦”笔名从事文学创作，曾在南大就学两年，后因贫病退学。1969 年大选，首次参选森美兰州双溪芙蓉州议席告捷，1974 年在原区连任，1978 年改攻雪兰莪州加影州议席，顺利当选。1986 年转战吉隆坡士布爹国会议席胜选，两度连任国会议员。廖金华是行动党的核心领导之一，曾任该党副秘书长、副主席等要职。他也是大马作协发起人之一，著有多部小说、散文与政论选集（潘永强，2004：355）。

经由南大校园学运的“启蒙”和洗礼，有斗争经历者倾向左翼政党是很正常的发展。一部分被当局开除和驱逐的校友，返回大马后就参与劳工党和人民党的活动。至于毕业的校友，投身政治运动的人数反而较少（潘永强，2004：356）。参加民间华人社团的南大毕业生不计其数，毕业于中文系的同学总数更是难以统计。

纵观以上所述，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无论是在教育、学术、传媒、文学、历史、政治等领域都有其贡献。这一批“文化人才”开垦了新马两地的文化创造与研究这片荒地，让新马两地的中华文化核心得以深化，进而承传延续下去。

第五章 结语

马来西亚华社的原型是侨社，从中国南下到来的先贤们绝大部分是赤手空拳在这片土地上开荒。尽管如此，华人移民保留了生活上的习俗与文化，随之成立乡团，然后创办学校和报馆，以承传自己的文化。华文教育是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堡垒。语文、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语文”是民族的“灵魂”，而“文化”则是民族的“根”，一旦被切断就无法吸取民族文化的滋养和精华，就会发生“失落”文化的危机。文化的承传须由教育开始，南大创立的其中一个重要考量点便是承传中华文化。

从新马华文教育背景，我们可知南大创立对于华社的重要性乃是基于华人社会对完整教育体系、培养师资、承传中华文化的需求。这三者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华社有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后，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华文中、小学师资，继而散播文化种子。此外，由于早期移民社会的文化深耕不足，新马社会有必要培养研究与创造核心文化的“文化人才”。中文系的文、史、哲课程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自是成为培养“文化人才”的摇篮。

新马地区最早创设的中文系是南洋大学中文系。南大中文系初创时期师资来源自中国，因而继承了传统中文系文、史、哲课程。虽然其课程在初创十年间几经修订，但依然遵循传统中文系课程的设制。这些课程无可否认的培养了具备“文化知识”的“文化人才”。中文系学会与出版物的发轫，也一并孕育着这片土地的文化人才。中

文系课程充实了学生的文化知识，而系学会与出版活动让学生学习实际操作文化推广的工作。南大中文系在初创的十年间，事实上有做好栽培“文化人才”的工作。

文化的本质是不断变动的。中华文化来到新马这片土地，遇上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与不同文化的相遇和撞击下，中华文化必会产生变化。再者，华人经过马来亚独立时期，国家认同从中国转变为马来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会趋向本土化。为了配合国族建构与民族文化认同，南大中文系课程也逐步进行调整，倾向本土化。加之 1963 年学潮的左翼思想发酵，从执政者的角度而言，本土化课程更要加快实行以稳定政治局面。1965 年的王赓武报告书对中文系课程的建议即可见本土化倾向。

1965 年新马分家后，新加坡独立，南大从此成为新加坡境内的大学。南大中文系在 1965 年学潮冷却以后至 1976 年再度改制前蓬勃发展，形成全盛时期。1976 年南大改制并逐步英化，1980 年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这一没落可追溯至 1967 年新加坡政府实施双语政策与 1973 年南大遵照新加坡政府“配合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停止招考大马学生开始。1976 年以后，南大的各种内忧外患导致发展面临困境，中文系亦难免于难。无论如何，南大中文系依然每年培养几十位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到各领域服务，扮演承传中华文化的角色。

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学术界的参与，扮演了对深层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之角色。在教育、传媒与文化界服务的中文系毕业生通过授业、新闻报道与编辑的方式传播与推广中华文化。文学创作则让中华文化核心以接近草根的方式普及。从中文系毕业生在这几个领域工作的参与，我们可以看见民族文化得以延续。

无可否认，中文系乃深化华人文化途径之一，南大中文系在深化中华文化的贡献不可抹杀。新马独立后，两地华人逐渐切割了跟中国祖籍地的种种联系；而新马分家后，两地华人又各自朝往不同方向前行。于是时代巨轮在历史轨道上留下一倒“Y”字型的深长纹路，上半截浮现新马华人本土化的足迹，下半截显示两地华人分道扬镳的脚印（李元瑾，2002：11）。新马两地的华人在文化承传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都是多元种族国家。新加坡以华人为主要族群，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为主导。新加坡是一个岛屿小国，天然资源并不丰富。在种种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国民团结的背景下，⁹新加坡为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存，其政府采取西化的政策，强调经济，提倡英语教育。新加坡华文教育面对双语政策的冲击，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则遭到不平等待遇。新加坡实施的双语政策以英语为主导，华人文化氛围渐渐萎缩，导致新加坡中华文化的未来面对困境。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已失去长期以来华教运动的领导地位，华教系统已瓦解；而马来西亚却在不平等的教育政策下发展完整的教育体系（李元瑾，2002：13）。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马来西亚华人坚决地维护地方传统，而新加坡华人或遗弃或利用它为国家服务；马来西亚华人对文化和种族认同非常执著，而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却有淡化的趋势；不过两地各存在消极和积极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年轻人对中华文化已出现疏离现象，而新加坡领导层已开始反省（李元瑾，2002：11-12）。90年代中国崛起，新加坡政府重新拾起中华文化，强调华文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华文的“使

⁹ 有关新加坡教育政策考量的建国背景因素，可参考（周聿峨，2002：126-128）。

用性”功能还是略胜一筹，政府注重的并非中华文化内涵问题。新加坡制度化的国家教育涵盖方方面面，而唯独将地方传统排除在外。重视英语教育的政策以推动国家建设、利用国际资源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些已经得到落实。对华人来说，“讲华语运动”已经降低了原来母语的价值。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的运用取其实用价值，但小心地绕开了与中国的情感关联（王赓武，2002：23-24）。尽管新加坡政府已开始关注“失去的”中华文化问题，但华人社会已失去大部分文化根基，要重新建立文化基础、重现坚实浑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仍需费煞心思。

如论文所提，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须由“文化人才”创造与承传。马来西亚、新加坡华社没有如中国古代明显的“士”阶层，因此得靠中文系培养“文化人才”来进行创造与研究文化。南大中文系的存在的确培养了“文化人才”以创造和继承中华文化。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实施和南大的关闭使到“本土”的“文化人才”出现断层，缺乏“文化人才”创造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文化内涵。有深层的核心文化，表演文化才有内容，才有背景支撑。未来民族是否强盛，与深层及丰厚的文化底蕴相关。

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朝向国际化倾向发展，系上缺乏“本土”人才。文化的创造其实需要从当地生活中的认识与经验累积，甚至产生感情。当有感情才会留恋本土，留在本土继续开创、承传文化。若无法结合本土经验，便无本土情感，很难研究与创造迎合本土文化情境的深层文化。诚如1965年王赓武报告书对中文系课程提出的建议，便是以本土经验结合中华文化来开创这片土地自己的文化特色。

至于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深化问题，借鉴自南大中文系的经验，可能得仰赖马来西亚目前的七所中文系。它们分别是马大中文系、南方学院中文系、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韩江学院中文系、拉曼大学中文系、博特拉大学中文组、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大学中文组。虽然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课程与程度不一，然而纵观马来西亚现有的中文系，在承传文化上可作出的努力空间尚很宽广。中文系尤其可以在文化深耕的工作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譬如培训、研究与创作。

中文系可以成为滋养文化接班人的摇篮，此乃因为中文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训练包括了思想、历史、文学等方面。因此，中文系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收了不少的“精致文化”之基础。文化还需要研究与创造，作为文化的延续，而不只是停留在现有表演文化层面。为此，中文系可致力于马来西亚的文化研究工作，深化中华文化，巩固其核心。

郑良树曾感叹“由于欠缺一个文化指挥中心，一个司令台，协调及统筹华族的文化活动和策略，所以华族无法将盈余的资源挪过去补贴那些少人、没人享用的上层文化”（郑良树，2008b：141）。中文系其实具备了成为一个指挥中心的各种条件。只要训练得宜，它有足够的去领导、协调和统一筹划各种文化活动。若中文系能够蓬勃发展为文化活动的领导中心，相信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回国。好让有志的学人们回到这片土地上，耕耘深层文化。如前所述，“文化人才”创造文化须有情感，若大马华社能够吸纳更多“本土”的“文化人才”，那中华文化的深化问题才有解决希望。

中文系将来也要思考如何推广深层文化，别让深层文化仅只停留在“士”阶层，应该落实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样文化才会有生命；让深层文化为华人族群供给思想价值，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总括来说，南洋大学中文系在 25 年间通过其课程培养了许多“文化人才”，为新马两地的中华文化承传与深化中华文化问题作出贡献。我们可以看见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而且重要的。

征引书目

(一) 专书及论文

- 成中英（1997）。〈社会变迁与文化传统的核心问题：知识与道德的平衡与整合〉，载林水椽主编，《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
- 崔贵强（1989）。〈自序〉，载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_____（1993）。《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 _____（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 邓日才（2004）。《南大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贡献》，载李业霖主编，《南大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417-428。
- 古鸿廷（1994）。〈星马华人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南洋大学的创立与关闭〉，载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_____（1999）。〈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困境（1951-1969年）〉，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24-25。
- 古鸿廷、张晓威、曹淑瑶（2006）。〈战后马来西亚地区福建人与华文教育之发展〉，载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古玉樑（2011）。《报业风云半世纪》。吉隆坡：大众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 何丙郁（2006）。〈回首当年：马大中文系初期〉，载许文荣、谢川成主编：《洪天赐教授七秩华诞几年论文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 何啓良（1998）。〈独立後西马华人政治演变〉，载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69-125。
- 胡兴荣（2006）。《记忆南洋大学》。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文斌（2005）。〈论马华文化的传承与文化人才的培养〉，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63-86。

_____ (2013)。《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劳悦强(2006)。〈学与术之取舍：新加坡近二十五年来汉学研究之发展〉，载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士古来、新加坡、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167-194。

李业霖(2002)。《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1953-1980)》。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李元瑾(2001)。〈南大学人·导论〉，载李元瑾，《南大学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_____ (2002a)。〈导论〉，《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13。

_____ (2002b)。〈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载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55-76。

_____、李业霖、陈松沾(2003)。《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一种：〈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

梁秉赋(2006)。〈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载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89-122。

廖文辉(2011)。《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林金树(2004)。《南大校友与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载李业霖主编，《南大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83-194。

林水椽(1998)。〈独立前华文教育〉，载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215-254。

林伟毅(2010)。〈自序〉，载何炳彪主编，《林伟毅卷 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

林远辉、张应龙(2008)。《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宏编，《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收入李业霖编(2002)，《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

- 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1953-1980）》，〈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王赓武谈“南大事件”〉。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391-396。
- 欧清池（2004）。〈为新华文学增添色彩的南大校友〉，载李业霖主编，《南大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69-292。
- 区如柏（2004）。〈南大校友在新加坡传媒的表现〉，载李业霖主编，《南大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47-182。
- 潘永强（2004）。〈把青春献给国家：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上的南大校友〉，载李业霖主编，《南大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349-364。
- 丘淑玲（2006）。《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韶义（1982）。〈在独立中学服务的南大校友〉，载傅孙中编，《纪念南洋大学创校25周年特刊》。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74。
- 王赓武（2002）。〈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载李元瑾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7-25。
- 王慷鼎（2002）。《钟灵中学四百校友人生之旅》。新加坡：王慷鼎出版。
- _____（2004）。〈南洋大学校友与新加坡高等教育〉，载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429-476。
- _____（2010）。《怡保育才中学校友升学就业调查研究（1950-1961）》。新加坡：王慷鼎出版。
- 王如明（1997）。《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新加坡：南大事业有限公司。
- _____（2005）。《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 王秀南（1970）。《星马教育泛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 许万忠（2004）。〈笔底生澜——南大写作人简介〉，载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93-314。
- 许醒吾（1950）。《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

颜清湟（2007a）。〈战前新马闽人教育〉，载陈剑主编，《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第五卷 颜清湟卷 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163-218。

_____（2007b）。〈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载陈剑主编，《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第五卷 颜清湟卷 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403-418。

_____（2007c）。〈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载陈剑主编，《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第五卷 颜清湟卷 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419-444。

叶金辉（2006）。《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困境与反思——郑良树教授访谈录》。新山：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

叶玉贤（2002）。《语言政策与教育——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比较》。台北：前卫出版社。

游若金（1987）。〈什么是国家文化？〉，载陈祖排编，《国家文化的理念——国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5。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_____（1999）。《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_____（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_____（2008a）。〈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147-158。

_____（2008b）。〈大马华社与中华文化〉，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135-146。

_____（2008c）。〈论儒家文化在新马的开发和运用〉，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23-234。

_____（2008d）。〈华教·马华文学·中文系〉，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67-269。

_____（2008e）。〈中文系和中华文化，〉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349-354。

- 周聿峨（2002）。〈移民族群的民族母语教育演化：新马华族母语教育比较〉，载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21-140。
- 周兆呈（2008）。〈双重国家意识的矛盾：新马一家时的南洋大学〉，载祝家华、安焕然主编，《探索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发展路向》。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35-62。
- 朱光潜（2001）。〈文学院〉，载杨东平编，《大学精神》。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庄迪澎（2006）。〈马新分家四十年两国中文报业演变比较〉，载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33-46。
- 庄康永（2006）。〈四十年来新马华人面对的“母语”问题〉，载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67-88。
- Jason Tan, S. Gopinathan, Ho Wah Kam(1997).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Book of Reading.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Prentice Hall Simon and Schuster (Asia) Pte Ltd.
- Sandra Khor Manickam(2005). Textbook and Nation Construction in Malaysia. 《亚太研究论坛》，第二十八期（6）：78-89。

（二）特刊与史料

- 白里斯葛（1959）。《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
- 陈六使（1956）。〈序一：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载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编纂，《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
- _____（1958）。《南洋大学落成典礼：主席陈六使先生、总督顾德爵士致词》。
- 傅孙中（1982）。《纪念南洋大学创校25周年特刊》。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 胡笏（2009）。〈想起中国语言文学系〉，载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南大第一届中文系出版：128-133。
- 教总教育中心编（1984）。〈1983年全国华团领导机构文化备忘录——对语文教育的建议与需求〉，载教总教育中心编，《教总成立卅三年华文教育史料》。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00。
- 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编委会（1999）。《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南大第一届中文系出版。
- 南大中国语文学会（1975）。《中文系师生著作书目索引》。新加坡：南大中国语文学会。
- 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2009）。《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南大第一届中文系出版。
- 南洋大学（1967）。《南洋大学1966-67学年度第十次教务会议记录》。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5）。《1974/75学年度南洋大学课程及选课》。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7）。《南大文学院手册1976-77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81）。《南大文学院手册1980-81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0）。《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69-1970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1）。《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0-1971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2）。《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1-1972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3）。《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2-1973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4）。《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3-1974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_____（1975）。《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4-1975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学。

_____ (1976)。《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5-1976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8)。《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7-1978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9)。《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8-1979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80)。《南洋大学常年报告1979-1980学年度》。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59)。《南洋大学概况195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3)。《南洋大学概况1963》。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6)。《南洋大学概况1965-66》。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7)。《南洋大学概况1966-67》。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9)。《南洋大学概况1968-6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1)。《南洋大学概况1970-71》。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2)。《南洋大学概况1971-72》。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4)。《南洋大学概况1972/73-1973/74》。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5)。《南洋大学概况1974-7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6)。《南洋大学概况1975-76》。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7)。《南洋大学学报1967》。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8)。《南洋大学学报1968》。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69)。《南洋大学学报196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0)。《南洋大学学报1970》。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1)。《南洋大学学报 1971》。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2)。《南洋大学学报1972》。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3)。《南洋大学学报1973》。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_____ (1975)。《南洋大学学报1974-7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1990）。《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南洋大学校讯编辑委员会（1974）。《南大校讯·37》。新加坡：南洋大学校讯编辑委员会出版。

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班编辑小组（1959）。《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一届毕业同学录》。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1959）。《中国语文学报1959》。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60)。《中国语文学报1960》。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61)。《中国语文学报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68)。《中国语文学报1968》。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69)。《中国语文学报1969》。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0)。《中国语文学报1970》。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1)。《中国语文学报1971》。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2)。《中国语文学报1972》。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3)。《中国语文学报1973》。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4)。《中国语文学报1974》。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5)。《中国语文学报1975》。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_____ (1976)。《中国语文学报 1976》。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

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文集编委会（1984）。《那晚在眉山——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南洋大学中文学会、诗社、大众传播学会——港台菲文化考察团纪念特刊编委会（1979）。《南洋大学中文学会、诗社、大众传播学会——港台菲文化考察团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注册处（1960）。《南洋大学科目表》。新加坡：南洋大学注册处。

唐尼（2009）。〈出掌校政的中文系毕业同学〉，载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南大第一届中文系出版：163-166。

王德丰（1970）。《南洋大学历届毕业生职业概况调查报告书》。新加坡：南洋大学辅导处。

_____（1972）。《南洋大学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毕业生毕业概况之调查研究（1968-69-1970-71）》。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出版。

_____（1974）。《南洋大学1971-72及1972-73年度毕业生就业概况之调查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出版。

魏雅聆（1960）。《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文化部。

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

Nanyang University(1970). Nanyang University Enrolment Statistics 1956-1970.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三）网站

〈北大简介〉，<http://www.pku.edu.cn/about/bdjj.jsp>，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介〉，
<http://chinese.pku.edu.cn/artDetail.jsp?channelArtId=82>，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李尚平：〈新加坡华文报业概述〉，〈新加坡文献馆〉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45>，浏览日期：2012年11月13日。

余定湘：〈纪念我的叔父余雪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余氏网，
<http://www.css2005.com/a/zixun/zongqindongtai/2011/0506/536.html>，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台大中文系系所特色〉，
http://www.cl.n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2，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台大中文系简史〉，
http://www.cl.n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瞻——春风吹拂，乔木抽芽〉，《新加坡文献馆》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186>，浏览日期：2012年11月3日。

〈系所成员〉<http://www.cl.ntu.edu.tw/members/teacher.php?class=150>，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早报的水平有待提高〉，早报论坛网，
<http://luntan.zaobao.com/viewthread.php?tid=155437>，浏览日期：2012年11月10日。

附录

附表一：历年系主任名录（1956-1966年）

年份	姓名
1956-58	余雪曼
1959-61（11月）	涂公遂
1961（12月）-62（2月）	高鸿缙（代）
1962-64（1月）	钟介民
1964-65（12月）	张瘦石（代）
1965（1月-7月）	王德昭（代）
	饶余威（代）
1965（8月）-1970（4月）	李孝定
1970（4月-10月）	文学院院长萧庆威（代）
1970（10月）-1975（6月）	皮述民
1975-1978	李孝定

资料来源：（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138）

附表二：历年南洋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系教师名录（1956-1966年）

1956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余雪曼
教授	凌叔华、潘重规
副教授	贺师俊
讲师	王詠祥、罗慕华

1957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余雪曼

教授	凌叔华、潘重规
副教授	刘太希、闵守恒
讲师	王詠祥、罗慕华、黄念容

1958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涂公遂
教授	余雪曼、凌叔华、潘重规
副教授	刘太希、闵守恒
讲师	王詠祥、罗慕华、黄念容

1959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涂公遂
教授	余雪曼、凌叔华、潘重规、史次耘
副教授	贺师俊、刘太希、闵守恒
讲师	王詠祥、罗慕华、黄念容、嵇哲
兼任讲师	韩素音
助教	邹达、祁怀美

1960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涂公遂
教授	余雪曼、史次耘
副教授	刘太希、黄勛吾
讲师	罗慕华、嵇哲、郑衍通、曹树铭
兼任讲师	韩素音、李星可、张瘦石、仝道章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许统义、翁世华
----	---------

1961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涂公遂
教授	徐纾、高鸿缙
副教授	刘太希、黄勛吾、张瘦石、钟介民、朱兆祥
讲师兼图书馆主任	郑衍通
讲师兼副校长室秘书	曹树铭
兼任讲师	韩素音、仝道章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许统义、翁世华、罗先荣、林源河

1962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副教授兼代系主任	钟介民
教授	高鸿缙、傅隸樸
副教授	黄勛吾、张瘦石、朱兆祥、杨宗珍
讲师兼图书馆主任	郑衍通
讲师兼副校长室秘书	曹树铭
讲师	葛连祥
兼任讲师	冯殿俊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许统义、翁世华、罗先荣、林源河

1963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副教授兼系主任	钟介民

教授	高鸿缙、傅隸樸、陈铁凡
副教授	黄勛吾、张瘦石、朱兆祥、杨宗珍
讲师兼图书馆主任	郑衍通
讲师兼副校长室秘书	曹树铭
讲师	葛连祥、黄六平、蔡寰青
兼任讲师	刘延陵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翁世华、罗先荣、林源河

1964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副教授兼代系主任	张瘦石
教授	傅隸樸、陈铁凡
副教授	黄勛吾、朱兆祥、杨宗珍
讲师兼图书馆主任	郑衍通
讲师	葛连祥、黄六平
兼任讲师	Dominic Gandolfi、刘延陵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罗先荣、林源河、苏新鋈

1965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系主任	李孝定
教授	傅隸樸、苏雪林
副教授	黄勛吾、张瘦石、朱兆祥、杨宗珍
讲师	葛连祥、黄六平、龚道运
讲师调任注册处秘书	赵松坡
导师	蔡寰青

兼任讲师	Dominic Gandolfi
助教兼文学院秘书	卢绍昌
助教	林源河、苏新銮、尹瑞霞

1966年度教师名录	
职位	姓名
教授兼代系主任	李孝定
副教授	黄勛吾、皮述民、杨承祖
讲师	葛连祥、黄六平（两者1966年9月1日离职）
讲师调任注册处秘书	赵松坡（旧制讲师调任注册处秘书）
讲师	龚道运、胡楚生
导师	蔡寰青（1966年9月1日离职）
兼任讲师	梁荣基（1966年9月1日离职）
助教	卢绍昌、尹瑞霞

附表三：1965年改制前后课程比较

科目类别	年级	1965/66（改制前）	1965（王赓武报告书建议课程）	1966/67（新学制始）	1970（新学制全面实施）
必修科	一	中文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现代中国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
		四部概要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un Yu & Meng Tzu)	中国古典文学（一）	专书选读（一）
		语言学概论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新文学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东亚通史	中华历代文选及习作（一）
		专书选读（一）论语或孟子	Malay I / 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马来文	英文
		文学院必修二科（见附录六）	—	—	—

	二	文字学	Chinese Etymology	文字学	中国文字学	
		中国文学史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中国文学史	中国声韵学	
		语法	Chinese Poetry	语法	中国诗歌及 习作	
		小说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Shih Chi or Han Shu)	专书选读 (二) 左 传、礼记、 史记或汉书	专书选读 (二)	
		专书选读 (二) 左 传、礼记、 史记或汉书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小说	中华历代文 选及习作 (二)	
		—	Malay II / Advanced Malay II	经学史	英文	
	三	声韵学	Chinese Phonology	声韵学	中国训诂学	
		修辞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I (Shih-ching or Ch' u Tz' u)	专书选读 (三) 尚 书、诗经或 楚辞	专书选读 (三)	
		戏剧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修辞学	中国哲学史	
		诗选	Tz' u and Ch' u	戏剧	词选及习作	
		专书选读 (三) 尚 书、诗经或 楚辞	—	诗选	—	
		—	—	—	—	
	四/ 荣誉 班	训诂学	Chinese Bibliography	训诂学	毕业论文	
		中国文学批 评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中国文学批 评	中国古文字 学	
		中国哲学史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哲学史	中国目录学	
		词选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词选	—	
		—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lassics: Shang Shu, or Li Chi, or Ch' un Ch' iu Tso Chuan	—	—	
	选 修 科	一	无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	Reading in Chinese Prose	中国散文选 读	马华文学
			—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东南亚近代 史	心理学概论
—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概 要	人文地理学 概要	

	—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
	—	Sociology I	社会学 (一)	社会学 (一)
	—	Economic Analysis I	经济分析 (一)	经济学原理
	—	—	—	中国通史
二	唐宋文选	Modern Chinese History	唐宋文选	中国近代史
	新文艺习作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新文艺习作	中国断代史 (一) 明清史
	华语语音学	Sociology II	华语语音学	社会学 (二)
	图书馆学	Any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in year I not taken.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导论
	—	—	—	中英翻译
	—	—	—	专书选读 (四)
	—	—	—	东南亚华人史
	—	—	—	小说及习作
	—	—	—	曲选
	—	—	—	新闻学导论
三	应用文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I	应用文	中国文学批评
	古文字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V (Chuang Tz' u, or Hsun T' zu, or Han Fei Tzu, or any other approved author)	古文字学	中国校勘学
	中学中文教材教法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中学中文教材教法	中国戏剧及习作
	专书选读 (四) 集部书选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专书选读 (四) 集部书选	新闻写作
	—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	新闻学导论
	—	History of Malaysia	—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史
	—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	图书馆学导论
	—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	中国断代史 (二) 宋辽金元史
	—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	东南亚地理
	—	Geography of East Asia	—	东亚地理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四 / 荣誉班	校勘学	无	校勘学	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东坡词）
	曲选	—	曲选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先秦心性思想研究）
	专书选读（五）庄子或韩非子	—	专书选读（五）庄子、韩非子或荀子	中国经学专题研究（左传/礼记/易经）
	语文专题研究	—	语文专题研究	—

资料来源：李业霖，2002：338-340；《南洋大学概况》，1965-1966，页 22-27；
《南洋大学概况》，1966-67，页 9-13；《南洋大学概况》，1970-71，页 198-213。

附表四：王赓武《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1965年）对中文系课程之建议

Year 1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hin. 11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Chin. 12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un Yu & Meng Tzu)	6
Chin. 13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6
Hist. 12	General East Asian History	6
Lang.	Malay I / Advanced Malay I (for 2 years)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Chin. 14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Chin. 15	Reading in Chinese Prose	3
Hist. 11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Geo. 12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6
GPA. 1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6
GPA. 12	Sociology I	6
Econ. 11	Economic Analysis I	6
Year 2		
Required courses		27 credits
Chin. 21	Chinese Etymology	6
Chin. 22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6

Chin. 23	Chinese Poetry	6
Chin. 24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Shih Chi or Han Shu)	6
Chin. 25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3
Lang.	Malay II / Advanced Malay II	6
Elective courses		9 credits
Hist. 23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Hist. 28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GPA. 25	Sociology II	6
Any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in year I not taken.		3/6
Year 3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Chin. 31	Chinese Phonology	6
Chin. 32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I (Shih-ching or Ch' u Tz' u)	6
Chin. 33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6
Chin. 34	Tz' u Ch' u	6
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Chin. 35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I	3
Chin. 36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V (Chuang Tz' u, or Hsun T' zu, or Han Fei Tzu, or any other approved author)	6
Chin. 37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3
Chin. 38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3
Chin. 39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3
Hist. 31	History of Malaysia	6
Hist. 32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3
Hist. 33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Period)	3
Geo. 26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6
Geo. 27	Geography of East Asia	6
GPA. 2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3
Honours Courses		
Chin. Hon. 1	Chinese Bibliography	
Chin. Hon. 2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Chin. Hon. 3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 Hon. 4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in. Hon. 5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lassics: Shang Shu, or Li Chi, or Ch' un Ch' iu Tso Chuan	
资料来源: (李业霖, 2002: 338-340)		

附表五：文学院中文系主、副修课程表（1975/76 学年度）

年 级	主修课程	副修课程	文学创作副修课程	备注
一 年 级	现代中国文学 论语及孟子 中国文学史 中华历代文选 语言学概论 英文101-102 英文201-202 体育	现代中国文学 论语及孟子 中国文学史 中华历代文选 语言学概论	翻译 散文及习作	① 主修中文系学生，亦得选读文学创作副修课程。 ② 『子史选读』一科，将在庄子、刘子、史记或其他该系指定之子史专书中，任开一科。 ③ 以中文系为主修，已选读第二年『中国诗歌』者，若选文学创作为副修，则不得再选『诗歌及习作』一科。
二 年 级	中国文字学 中国语音史 中国诗歌 子史选读 中国文学批评 星马华文文学 中国小说	在主修课程中修读两科	现代小说及习作 现代戏剧及习作	
三 年 级	比较文学 诗经 楚辞 中国哲学史 中国训诂学 词曲选 现代中国语言学	在主修课程中修读两科	诗歌及习作 修辞及习作 文学原理	
荣 誉 班	中国古文字学 中国目录学 中国语言学专题研究：华文第二语文教学法 中国文学专题研究：诗选学 中国文学专题研究：宋词——东坡词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魏晋玄学 中国经学专题研究：左传 现代汉学	修读四科		
	毕业论文			

资料来源：《南洋大学概况 1975-1976》，页 94。

附表六：文学院必修科目表 1965/66（改制前）

组别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教学内容	学分	年级	备注
第一组	文101	中文	选读古典散文，中文习作，指定阅读参考书。	6	一	各院系共同必修
	文102	巫文（一）	训练学生阅读及书写通顺之马来文。	6	一	英或巫文必修其中一科
	文103	英文	加强学生之语文基础及英文写作之能力。	6	一	现语系学生必修英文
第二组	文104	世界文化史	原始人类；古代河谷文化：埃及、美索柏达米亚、印度；波斯帝国；爱琴人、腓尼基人及希伯来人；希腊城邦；希腊文化；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印度文化全盛时期；中国文化对东南邻邦的影响；基督教的胜利与西方野蛮民族；拜占庭帝国；回教的兴起及穆罕默德帝国的扩张；封建制度下的欧洲；政治及经济制度、宗教与思想的发展；现代文化。	6	一	1. 必修二科
	文105	政治学	政治学的基本观念，国家的起源，国家活动范围，政治组织的方式，国际关系及组织，现代宪法及政府组织。	6	一	2. 中文系学生必修文学概论
	文106	经济学	见商102	6	一	3. 历史系学生必修世界文化史
	文	法学通论	上学期授课：法律之渊源，新加坡与马来	6	一	4. 地

	107		西亚之法院，契约法（契约构成要件及其履行），侵权行为法（一般原理及特殊侵权行为）。下学期授课：国民与国家，刑法（总则），财产法——土地法，信托法（私人信托与公共信托、受托人及受益人），继承法（立遗嘱及未立遗嘱之继承、私人代表）。			理系 学生 必修 地学 通论
	文 108	地学通论	地理学的性质和范围，地球及其运动，气候，地形和海洋，地球资源，人口和聚落，农业和工业，贸易和交通。	6	一	5. 教育系 学生 必修 心理学概 论
	文 109	哲学概论	研讨知识论之各问题，如知觉、共相、真伪等等。又略论形而上学中各问题，如物质、心灵、时间、空间、因果、自由及宇宙之本源等等。	4	一	
	文 110	伦理学概论	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概念及心之活动，判断与命题，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4	一	
	文 111	心理学概论	心理学的性质，反应机构，生长发展及成熟，动机行为，情感及情绪，注意及知觉，智力，人格，学习，记忆及遗忘，思考及语言，社会行为。	4	一	
	文 112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的成立及其发展，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社会的一般形态与各种组织，以及现代几个普通的社会问题。	4	一	
	文 113	文学概论	总论：文学定义、内容及形式，目的与特质，起源、背景与派别，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历代文学体制之演变。分论：诗、词、曲、赋，文章，小说戏曲，文学批评。	4	一	